

城市中国

URBAN WISDOM ADVANCING WITH CHINA

Learning

From

Our

Next

Generation

Creating Child-Friendly Cities for All Ages

向我们的下一代学习 共建全龄友好的 儿童友好型城市

RMB 60.00 HKD 60.00 EUR 15.00
USD 20.00 GBP 12.00

ISSN 1009-7163 CN11-4557/GO



97 71009 716056

① 我喜欢在家里玩，因为在家里随时都可以玩

8. 在学校中，我喜欢操场，因为在操场上，我们可以做很多有趣的活动。放学后，我喜欢在家里玩，一般去小区楼下和好朋友玩，我们可以拍皮球、捉迷藏……

8. 在学校中，我喜欢操场，因为在操场上，我们可以做很多有趣的活动。放学后，我喜欢在家里玩，一般去小区楼下和好朋友玩，我们可以拍皮球、捉迷藏……

I like playing outside because it's greener outside. You can also explore different things and you get the fresh air.

I would have my friends houses close to mine so I could see them.

7. 我有在周末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我喜欢和朋友一起找好玩的地方，一走路买东西，很开心，一点也不害怕。

8. 我在学校里，我喜欢去操场玩，因为可以在操场上打篮球、踢足球，特别。放学后，我最喜欢和同学在操场上踢足球。

5. 我曾在河边玩耍，我的家没有提在靠近水的地方玩得更开心。

5. 我曾在河边玩耍，我的家没有提在靠近水的地方玩得更开心。

8. 在学校中，我喜欢在操场上和朋友聊天，打发中午的时光。放学后，我最喜欢在家里玩。周末，我一般去小区里玩。

8. 我在学校中，最喜欢小木屋，因为在小木屋可以和朋友、同学们一起玩耍，聊天，打发中午的时光。放学后，我最喜欢去小区里的游乐区玩。周末，我一般去东边踢球，吹吹海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8. 我在学校中，最喜欢操场，因为在操场上，我们可以做很多有趣的活动。放学后，我喜欢在家里玩，一般去小区楼下和好朋友玩，我们可以拍皮球、捉迷藏……

5. 我曾在河边玩耍，我的家没有提在靠近水的地方玩得更开心。

1. 我喜欢在家里玩，因为在家里我可以用手机给同学发消息和画画，非常有趣。

1. 我喜欢在学校里玩。因为可以和小伙伴一起做游戏、讨论题目还可以在体育课上踢足球、打篮球。虽然身上的衣服湿透了，但我的开心极了。在学校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一定要珍惜在校的时间。

7. 我有在周末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我喜欢和朋友一起找好玩的地方，一走路买东西，很开心，一点也不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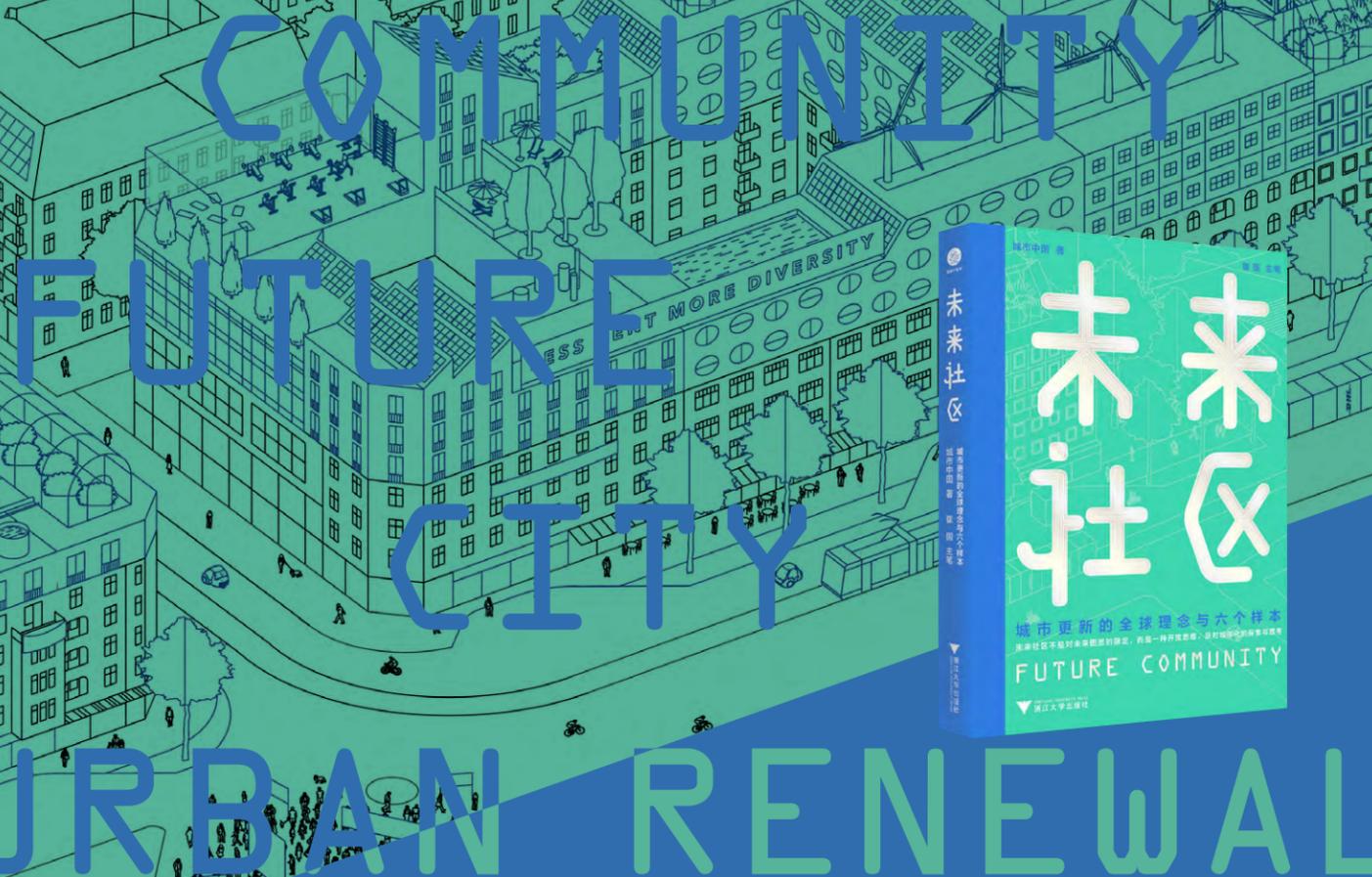
8. 在学校中，我喜欢在操场上和朋友聊天，打发中午的时光。放学后，我最喜欢和同学在操场上踢足球。

5. 我曾在河边玩耍，我的家没有提在靠近水的地方玩得更开心。

8. 我在学校中，最喜欢小木屋，因为在小木屋可以和朋友、同学们一起玩耍，聊天，打发中午的时光。放学后，我最喜欢去小区里的游乐区玩。周末，我一般去东边踢球，吹吹海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城市中国》研究团队最新成果： 《未来社区：城市更新的全球理念与六个样本》

现已在当当、京东、淘宝等平台上架



新的挑战和机遇下，城市将如何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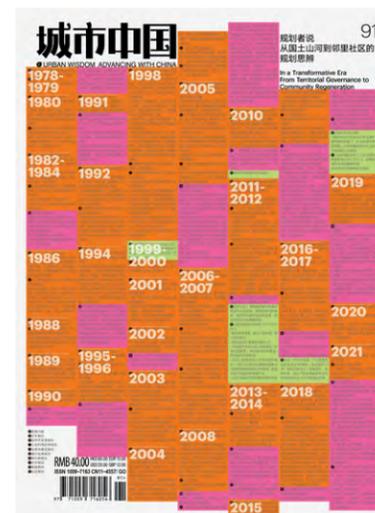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要如何承载人们对未来栖居模式的想象？

存量更新背景下，过往城市建设所导致的大量城市病，正激发着人们对人居环境的再思考。同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迭代，亦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关于未来社区的实践与讨论。本书是《城市中国》研究团队对“未来社区”这一话题的长期跟踪研究。我们以详实的案例和洞察，构建起“未来社区”的理论与实践框架。话题从多角度切入，试图传达一种理解：探讨未来社区，不是对未来图景加以限定，而是以更开放的思维探索城市化的未来。

扫描二维码
查看城市中国“未来社区”
系列微信文章



作者_城市中国 著，崔国 主笔 / 出版社_浙江大学出版社 / 策划方_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 出版时间_2021年8月 / 页数_260页 / 定价_68.00元 / ISBN_978-7-308-19969-8 / 包装_平装双封



规划者说 从国土山河到邻里社区的 规划思辨

《城市中国》杂志 NO. 91 期选题“规划者说：从国土山河到邻里社区的规划思辨”，试着以图解形式梳理了现代城市建设发展谱系和1978年以来的城乡建设热潮，对比分析了十年间，大众对城乡规划到国土空间规划变迁的认识。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体系以及对空间治理的相关空间规划，根据尺度大小和规划类型出台时间先后，选取了城市群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规划、旅游规划、乡村规划、社区规划等类型，分别访谈相应规划工作者以及规划信息化工作者，从他们的实际工作和亲身感受出发，来展现过去的空间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在工作内容、方法等方面的不同；通过呈现一线规划师的工作状况，揭示规划工作者需要更新的理念、知识结构和工作方法技术，探讨对规划师身份与职责的再认，以及规划设计市场的变化、规划设计单位的发展前景和规划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建议。其中基层社区规划因为面向城市治理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与效率，也成为本期讨论的热点，特别呈现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的社区规划实践与创新。

编辑部联系方式栏



微信公众号: uc_urbanchina



APP: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 城市中国

官方邮箱: 00urbanchina@urbanchina.com.cn
官方网站: http://www.urbanchina.com.cn/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urbanchina/
豆瓣主页: http://douban.com/people/urbanchina/
官方淘宝店: http://urbanchina.taobao.com/(暂停)
发行部电话: 021-65982080-8039
海外观察员项目联系邮箱: cgciguoguo@urbanchina.com.cn

读者评论



城市中国里的老友记

这种风格的房屋真的好适合朋友们一起聚餐开派对，瑞秋生日就是给爸妈各开了一个生日派对，那一集笑死。不过文中说莫妮卡作为餐厅服务员付不起这样的房租，但我印象中莫妮卡说这房子是她奶奶留给她的呀。**#城市中国#老友记**

——新浪微博@半生瓜呱呱呱呱



一家大学城里可以洗衣服的社区咖啡店

《城市中国》里面有篇文章写的是社区交往。社区的公共空间变成可以让人们经常相遇并互相信任的地方。

·人们希望交往

现在普通人们的交往空间其实很窄，尤其对于内向一些的人，在公司、超市、家之间来回，街道是单纯的行走空间，行人只想迅速穿越。如果不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根本没有机会遇到什么人。(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越来越难脱单)在南京东路步行街和在一家社区商店的社会性是不同的，前者遇到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遇到，后者遇到的人也许会天天遇到。来爱欢洗的人一般都是附近的居民或者学生，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区域，有着同样的想法(要么来喝咖啡自习，要么是在等洗衣服)，足够变得熟悉。(来这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熟客，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我还免费喝了用一位熟客带来的豆子做的手冲，喜欢这种自由温暖的氛围)

·人们希望的是主动的交往，不希望被纠缠到所有的交往中去

良好的社区交往是，当你下班或闲着想放松一下，你可以走进社区，走进街道，但如果你累了不行，你同样能选择避免交往。如果你想，走进社区咖啡店或者居住的街道附近，遇到一些邻居或同学或初次见面的人，和他们一起感受正在生活的地方，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如果你不想，可以直接回家休息，也没人会打扰你。希望长沙能有越来越多的这种适合年轻人的良好的社区交往，我估计中老年人可能就麻将馆见了。**#빨래 데이(注:洗衣日) #ifunwash 爱欢洗**

——新浪微博@TATNONO



第一次知道作者，是在这书面世前的《城市中国》杂志里，最近一次读到他的文字是在他公众号“空余恨”前两天的推送里。《王子之城》是王子(现名王子白)2006年自出版的一本摄影集，书里选用他2003年到2006年在前门胡同拍过的199张照片。文中叙述引用影集里的介绍，作者立场仅代表当时社会环境，不代表今天城市发展现状。找到这本影集，拍成翻书视频。分享给大家。

——新浪微博@摄影人阿灯

规划视角下的全年龄友好型城市思考

Thinking of All-Age-Friendly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nning

文 / 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
Text / KUANG Xiaoming [Chief Editor of UrbanChina]



未来的城市应该是全龄友好型城市，是以人民为中心，对儿童、中青年、老年人均等友好而广泛包容的城市。全龄友好的概念虽然是以全体人民群众为对象，事实上表现为倾向于弱势一方的表述。目前面向老年人和儿童的社会服务和均好性显得相对不足，且不能完全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一老一小”成为城市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是全龄友好关注的重点对象。从目前的问题导向来说，全龄友好即指儿童友好和老年友好的叠加。相比而言，最为迫切的是老年友好，需要精细化治理；对于市场失灵的部分，通过政府的公共干预进行弥补，同时要注重老年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全龄友好城市建设，应该纳入城市规划体系，通过总规和详规来加以落实，按照规划上的体检、评估、公共参与等环节来确定标准和体系。

最为迫切的是老年友好

The Most Urgent Is Elderly-Friendly

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以此为标准，我国自200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此指标显示的不同省份，辽宁和重庆都超过了17%，四川、上海和江苏都超过了16%。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教育部、科技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其中提到，“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因此，庞大的老年群体是全年龄城市建设的首要关注点。

与此同时，老龄工作顶层设计不断加强，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2019年)和《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2021年)。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并提出,2025年年底前,每个县(市、区、旗)有1所以上具有医养结合功能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二十大”报告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部分，有9处提到“老”字，可见对老年人的重视。所以建设全年龄友好型城市，首当其冲是要解决城市老龄化的问题。

从中青年到老年，主要的服务战场在儿童，服务不足恰恰是在老龄群体，需要通过政府的公共干预进行弥补，为老年人提供公平的设施。消除社区老人和社区生活的障碍；提供在宅和社区养老、社会养老的全方位养老健康服务；形成对老年人友好的城市环境，包括生活上的自尊。帮忙不一定是老年人所希望的，尊严和权利以及精神追求将是未来老年友好的重要关注点。

老年友好提倡建设健康、包容、安全、有韧性的可持续的城市或者社区。早在1989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做出了新的定义，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设计上主要包含这几点：一是保障老年人的移动性，消除空间上的障碍。二是关注老年人身心和环境健康。第三是交往的功能。第四是环境卫生。第五是精神向往。城市规划主要关注外部居住环境和养老服务设施，设计上主要包含四点内容：布局与选址，内容配置，道路和交通的可达，以及场地和健身。

关注儿童权利的要求

Demands for Attention to Children's Rights

1989年联合国决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中提出儿童具有生命权、受保护权、发展权与参与权四大权利，儿童友好的最基本内涵就是尊重儿童的这些基本权利。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联合国人居署正式提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议将儿童的根本需求纳入街区或城市的规划之中，即通过一定的措施，提升原有街区或城市的儿童友好度。这样儿童友好城市的概念得以落地，其中包含四个核心要义，即面向儿童的友好政策、友好人文、友好服务和友好环境。以往的城市规划强调空间和设施，但学校设施并非按照儿童高度设计，也并未听取学生的声音。未来的儿童友好是儿童权利的要求，而非物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部署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点任务。深圳走在全国最前列，于2015年底就开始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探索实践，深圳10个区(新区)均在社区成立了儿童议事会，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地方标准。在社区招募有爱心有热心的儿童担任议事员，围绕社区安全、社区规划、社区课堂、社区管理等，开展儿童议事会活动，让儿童不仅发声，且以主人翁身份参与社区治理。成都出台的《成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要引入“1米高度看城市”的儿童视角，推进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标志性的事件是2021年10月15日，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对此建设意见，有以下几点体会：一是体现儿童视角。以前的设计和标准都是为了成人，现在是从儿童的视角来制定建设标准。二是丰富儿童的服务设施。三是推进城市公共空间的适儿化建设。四是开展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五是开展儿童友好的自然生态建设。六是服务儿童看病就医和医疗保障。七是改善儿童安全出行体验。八是净化网络环境。总体上，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关键是要从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来推进。

跨年龄空间的复合使用

Compound Use of Spaces Across Ages

从目标来看，要适应老人、儿童的针对性空间的专业化精细化管理。空间复合其实是人力资源的使用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老年人进行一定的适量劳动，对自身健康比较有益。跨年龄群体在同一空间，其实就是现状空间复合使用的问题，也是城市规划的高级探索。要实现三代人使用同一空间，第一，需要在熟人社会，对老人的偏好和身体状况有所了解；第二，对空间功能的复合组合也要满足三代人各自的需求，比如老年人带孙子。

笔者及团队在北京通州一个社区更新项目，就是跨年龄空间使用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地址在杨庄路22号院，在这个熟人社会，围绕儿童活动场地，放置大量的能够用视线看护儿童的老年设施，然后在外圈放置座椅。这是一种在视线范围的空间和功能组合，效果良好。

空间的精神陶冶，最重要的是交往空间，空间的复合使用可以通过交往培育情怀，开展社区互助。老年人传递信息的力量非常巨

大，退休人员是社区的一种资源。社区更新应该充分发挥社区人力资源的优势，培养社区自治和互助的能力。在规划落实上，就笔者所做的社区规划和项目所在城市的情况来看，还是重物质轻社会。

笔者曾在北京通州后南仓小区进行社区规划调研，公共参与阶段，有居民抱怨老人们在小区公共活动空间下棋打扑克牌，不仅吵闹，还在附近就地撒尿，无法忍受。其实在小区公共活动空间，老年人上厕所不方便的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这部分内容应该实施“多规合一”，纳入城市规划体系，通过总规和详规来加以落实。首先在总规里面加入这个章节，按照体检、评估、公共参与等环节来确定标准和体系，比如对全龄友好定性、定纲、定总量，尤其在城区层面。第二是纳入控规。这里所指的控规是一种单元控规，上海的街道和镇便是控规编制单元，在这样的单元里落实全龄友好空间的量化指标。新城相对容易，难的是城市更新。因此在城市更新导则里面要落实“一老一小”设施的总量。

公园城市即全龄友好的空间载体

Garden City Is An All-Age-Friendly Space Carrier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2月11日来川考察，提出了公园城市的理念。笔者担任天府新区的总设计师，进行了公园城市的深入研究，成立了公园城市研究院。经过一年的研究，形成了基本的概念、体系方法和公园城市的定义。公园城市是生态文明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将公园形态与城市更新有机融合，关注人的需求，统筹协调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是现代化的可持续的城市建设的新模式。公园城市理念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即全年龄友好的概念。以人民为中心与全龄友好的内涵是一致的，全龄即是把城市的人民精细化分解，包括老人、儿童和中青年三个群体，然后有针对性的研究其中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公园城市该做的事情。同时，公园形态和城市更新有机融合，不仅反映了人、城市和自然的有机共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大量的系统化的城市绿色空间体系，为全龄友好的城市建设提供了物质空间载体和保障，例如成都的绿道属全球最长，为青年人提供骑行、运动和交往的空间。大量的以绿道串联的空间，在满足生态廊道和斑块的系统化的生态思维的基础上，也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生态体验空间，为儿童友好提供学习、户外体验、探索。认知大自然的场所。这当然也为老年人提供了户外休闲交往的空间。成都的公园城市具有大量的系统化的载体，每个公园都是相连的、带状的或线性的系统性空间，移动能力较好的老人可以进行户外运动。互联网新时代，老年人可以通过互联网线上交流。智慧城市的建设有助于老年人自动呼叫，比如日本的家庭看护探头，一旦老人摔倒，能自动呼救、报警。

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城市规划参与全龄友好城市建设，从精细化治理的角度应对所面临的问题，保障儿童、中青年及老年友好三大领域的包容性。全龄友好城市建设可以分为城区和社区两部分，城区的部分集中在在公共空间，比如盲道、无障碍坡道等。社区的部分因为涉及日常生活，除了面临空间问题之外，还包括社会问题、自治问题、互助问题、养老问题，等等。因此，社区的全龄友好难度更胜于城区。📍

目录

刊首语 EDITORIAL

规划视角下的全年龄友好型城市思考

Thinking of All-Age-Friendly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nning

文 / 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 …………… 004

城市研究 URBAN STUDIES

中国住宅的可能性与建筑学的当下性

The Potentials of Chinese Housing and the Contemporariness of Architecture

文 / 胡之乐 + 郑时翔 编辑 / 张晶轩 + 崔国 …………… 008

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时代的新邻里规划

——以金地华东的社区规划实践为例

New Neighborhood Planning in the Age of Fifteen Minutes Community Life Circle

Taking Gemdale’s Community Planning & Practice in East China as An Example

文 / 城市中国 & 金地华东 …………… 018

编按 PROLOGUE

向我们的下一代学习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呼唤对儿童需求与城乡发展规律的本质探究

Learning from Our Next Generation:

Child-Friendly City Construction Calling for Exploration of Children’s Need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Law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文 / 匡晓明 + 山冰沁 …………… 028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国际视野与中国实践展望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ld-Friendly Cities and Prospects for Chinese Practices

口述 / 沈瑶 编辑 / 山冰沁 + 张馨丹 [湖南大学] …………… 032

从老城厢孩童身上学到的

Learning from the Children of Old City, Shanghai

文 + 摄影 / 施佳宇 …………… 038

深圳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先行实践

Pioneering Practices of Child-friendly City Building in Shenzhen

口述 / 刘磊 编辑 / 山冰沁 资料提供 / 陈晓宇 [深圳规划院] …………… 058

让荒野回归城市，将自然带给童年

——从生态修复的角度浅谈儿童友好型城市

Let the Wildness Return to City, and Bring Nature Back to Childhood:

A Brief Discuss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Restoration

文 + 图片 / 郭陶然 编辑 / 山冰沁 …………… 070

让城市儿童回归自然的非结构化自由游戏

Bringing Urban Children Back to the Unstructured Free Play in Nature

文 + 图片 / 杨丹 编辑 / 山冰沁 …………… 080

可玩性城市：英国儿童游戏环境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借鉴

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博士后汤湃

Playable City for Children: Learning from Play England

Interview with TANG Pai,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采访 + 编辑 / 山冰沁 图片提供 / 汤湃 …………… 090

由社会环境教育出发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Building Child-Friendly Cities Based on Social Environment Education

采访 / 丁馨怡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编辑 / 山冰沁

图片提供 / 彭婉琰 + 简颖诗 + 李自若 …………… 096

解语儿童：他们如何观察、理解和“使用”城市？

Learning from Children: How Do They Observe, Understand, and “Use” Our Cities?

文 + 采访 / 袁菁 …………… 116

儿童友好型住房：政策规划与社区设计

Child-friendly Housing: Poli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Design

文 / 李康 编辑 / 山冰沁 …………… 126

老幼融合：未来规划中“一老一小”的关系构建

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姚栋

Integrated Eldercare and Childcare: Form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derly and Children” in Future Planning

Interview with YAO Dong, Associated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采访 + 编辑 / 山冰沁 资料提供 / 林耀 [同济大学] …………… 136

县级市下的儿童友好之路与家庭教育支持

Child-friendly Pathway and Home Education Support at the County Level

文 / 山冰沁 资料提供 / 赵欢 + 钟赟 …………… 144

守护街道中的童年

——儿童友好型街道实践

Guarding Childhood in the Streets: Child-Friendly Street Practices

文 / 惠英 + 廖佳妹 编辑 / 山冰沁 …………… 154

儿童友好型灾害管理的国际经验与实践

Global Practices in Child-Friendly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Response

文 / 周艺娴 …………… 164

当“儿童友好型城市”下沉至社区

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董楠楠

When “Child-Friendly Cities” Go Down to the Community

Interview with DONG Nannan, Associated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采访 + 编辑 / 山冰沁 …………… 174

您的城市是否对儿童友好？

UC 儿童友好型城市现状与建议调查问卷反馈

Is Your City Child-friendly?

Results from UC Questionnaire about Current Condi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Child-friendly Cities

文 / 山冰沁 …………… 178



上海老城厢孩童在传统的窄街小巷中安全而自由地探索 (摄影 / 施佳宇)
Children explore safely and freely in the traditional narrow streets and alleys of Old City in Shanghai. (Image Source / SHI Jiayu)

中国住宅的可能性 与建筑学的 当下性

文 / 胡之乐+郑时翔 编辑 / 张晶轩+崔国
Text / Hu Zhile + Zheng Shixiang Edit / Zhang Jingxuan + Gehry

建国以来，住房被逐渐赋予了大量超出空间使用本身的意义，它作为集体主义的具象形态、作为快速城市化的推进器、作为金融资产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其作为建筑的内核却逐渐模糊。在房地产还是新兴行业的本世纪初，建筑领域曾掀起一段探索住宅新可能的热潮。人人都在试问：“中国现代性住宅的前景是什么？”彼时的建筑师们风华正茂，孜孜以求。但在地产开发逻辑下，基于空间形态和体验的设计策略让位于利润优先的最优平面排布逻辑，使用者的个性化需求让位于千篇一律的批量化生产。这种表象之下，还使得中国几千年来自主筑屋造房传统骤然停止，居住者与居宅之间的联系，从根本上被切断。在这复杂境遇下，西方建筑理论体系以及受此训练的建筑师们，处于尴尬的“失语”状态。“知名建筑师不做住宅”似乎成为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体无意识。然而，面对贫瘠的都市景观，建筑师若继续逃避这种复杂的“当下性”，便也断送了中国住宅的可能性，断送了建筑师兼济天下的担当。

THE POTENTIALS OF CHINESE HOUSING AND THE CONTEMPORARINESS OF ARCHITECTURE

WJ STUDIO 万境设计的 Misa Studio，一层是修理机车、做木的爱好天地，二层的会客厅和厨房岛台完全敞开。与惯常的住宅风格不同之处在于，整个房子的开敞空间要远多于封闭空间。（图片来源 / WJ Design 万境设计）



胡之乐
WJ STUDIO 万境设计创始人/
设计总监，PRO-LAB 发起人。



郑时翔
FOX Architects 建筑设计师，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



1973年，上海石库门里弄俯瞰。(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Overlook of Shanghai Shikumen Alleyways in 1973. (Photography / Harrison Forman)



张氏帅府西院，杨廷宝，1931。(图片来源/百年巨匠)
 West Wing of Marshal Zhang's Hall, YANG Tingbao, 1931. (Photo / Bainianjujiang)



集雅公寓，范文照设计，1934。(图片来源/wikipedia)
 Jiya Apartment, Designed by FAN Wenzhao in 1934. (Photo / wikipedia)



上海隆昌公寓，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初为公共租界巡捕房，解放后为公安分局职工宿舍，之后逐渐变成混杂聚居地。(摄影/崔国)
 Longchang Apartment in Shanghai, built in the 1920s-30s, was originally a patrol hous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cession. After 1949 it became a staff dormitory for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and later gradually turned into a mixed settlement. (Photography / Gehry Cui)

同西方居住理念完全不同，住宅对中国人有着无可比拟的意义：刚需、户口、稳定性、发展机会、子女教育……当人们讨论起都市生活，“漂泊他乡”的孤独感往往同“还在租房住”划上等号；“站稳脚跟”的标志也常常是“在城里买了房”。也许正因对“拥有”“占有”太过在乎，人们反而对住宅内涵的精神性毫无想法——每个人过着千差万别的人生，却都住在差不多的房子里。

这一切的成因都有据可循。1998年房改后，房地产消费正式被作为拉动内需的发动机，声势浩大地运转起来。于是住宅被抽去建筑的内核，施以由内而外的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属性。20多年的极速发展建设，让我们无暇顾及住宅本可以追求的多样性和精神属性，而用模式化的设计方式解决生产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封闭小区内，一幢幢高度相似的高层住宅楼被快速复制粘贴出来，随即立马推上市场等待抢购，“千城一面”的都市景观以极快的速率覆盖土地。

购房者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地段、户型、得房率、绿化率这些标准参数，却从未有对兴趣和精力思考“家是什么”这种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市场提供什么，消费者就接受什么，并以高度一致的评价体系作为对住宅优劣的判断标准。建筑师对此也保持缄默，他们刻意回避住宅问题，转而将设计精力投放到公共项目。因为他们意识到，对于住宅而言，已经很难有一个切入点让他们发挥专业热情——建筑学在面临房地产运行法则的时候是失语的。

历史的抉择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造成了单一性困境。中国住宅建筑能够萌芽出什么新的可能性？建筑学又能做什么？也许答案就隐含在当下的局面之中。

从“土洋结合”到“98房改” From “Combinatory Style” to “1998 Housing Reform”

中国住宅建筑的发展历程是一条从混杂糅走向单一简化的崎岖路径。

二十世纪初，旧中国的住宅建筑呈现一种传统民居与西洋样式的混合状态——传统民居发展自各地人民历史悠久的居住智慧：应对气候、本土材料；而西洋样式则缘起于西方侵略者带来的各国建筑文化，因此在租界地区洋楼繁盛、恍若异国。上海石库门、天津五大道、开平碉楼……无不是中西相融。虽然我们一致批判侵略行为，但从历史遗留物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看，当时民居建筑的丰富形式实属蔚为大观。

这种奇观随后出其不意地愈演愈烈。1924年以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相继回国，他们在校期间，接受了从巴黎美术学院体系 (Beaux-Arts, 也称布扎体系)，到现代主义过渡的建筑学内容，因此他们精通西方古典建筑形式法则，也以开放的心态开始研习现代主义国际范式。之后近半个世纪的动荡时局里，他们在中国艰苦卓绝地实践当时西方的建筑学理论，并探索与传统相合之法，

也造就了一些如今依然充满理论价值和历史况味的住宅建筑。

由杨廷宝设计，位于沈阳、建于1931年的张氏帅府西院公寓楼，用红砖白筑的都铎风格 (Tudor Style)，配合具有哥特式饰趣的细部——虽是西洋样式，但经过中国建筑师修改化用，确也符合当时的审美取向；对于现代主义在住宅上的运用，最为典型的便是上海徐汇区始建于1934年的集雅公寓 (Georgia Apartments)。由范文照设计，立面风格简洁，内部小户型为主，类似于如今的单身公寓——这种现代主义形式的住宅在当时绝属开创。中西建筑师的各自实践、外来和本土的激烈冲撞、新旧时代理论的转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住宅建筑设计，虽无自下而上的需求整合，也无自上而下的固定章法，但因雄心壮志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加入而更为异彩纷呈。

新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住宅建设统一由政府出资。借鉴苏联的住宅理论，当时的建设目标仅仅是“居者有其屋”，只作为满足生存需求的最低保障。加上这一时期政府的主要力量放在工业生产上，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的建设在其次，因此住宅紧缺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粗糙的简易楼、筒子楼是人们对建国后住宅的最初印象，楼内通常多户公用厨房、卫生间和走廊空间，以满足所谓集体主义生活的想象。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人们对住宅建筑的质量和居住体验逐渐有了认识和追求。“1993

年北京优秀住宅设计”竞赛的获奖方案，基本代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住宅设计理念。从获奖作品不难看出，在当时“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指导下，“三大一小一多”，即“大客厅、大厨房、大卫生间、小卧室、多储藏空间”，是住宅所追求的优秀布局形式——显然是对早年简易楼造成的居住问题的修正。一等奖“六彩方案”的设计师，在项目解说中提到了采光通风、隔热保温、朝南房间、标准化定制门窗、入口私密性等设计要点。如今看来，当年这些被视为先进、现在依旧在被讨论的设计要点，几乎成了建筑学对住宅设计最后的贡献。

199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取消住房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统包的体制，改为国家、单位、个人三者负担。随着住房福利分配进入尾声，一系列相关制度也逐步建立：推出经济适用房和优质商品房以满足不同家庭收入情况，建立住房公积金、住房信贷体系等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让扩大内需、刺激居民住房需求成为了首要任务。于是199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要求在当年下半年完全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现个人购房制，并鼓励住房金融、规范住房交易市场。规模浩大的住房改革，让中国正式开始进入商品房时代，房地产行业也逐步堆积体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房改制度的准确定位拯救了当时的经济，并开启了接下来十年的高速发展。



《城市中国》第19期《中国家庭：现代化冲击下的中国家谱》、34期《中国人居：幸福幻象下的居住困境》分别从中国人的家庭结构，以及快速城市化过程下的居住问题等角度，再审视了中国人的现代居住方式变化原因及可能性。
 The 19th and 34th issue of “Urban China” magazine explored the reason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hou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housing issue under the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土地财政。1990年国家正式推出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与98房改配合，这一制度盘活了沉睡多年的城市隐形财富，地产商大量拿地建房，使地方政府“一夜暴富”。更多、更高价地产项目的建设，意味着更高的土地财政收入，也意味着更充沛的政府资金可以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展开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地产和基础设施相互加持，城市化与“推倒重建”的发展思想齐头并进，大量的房地产楼盘仿佛“一夜之间”冒了出来。

无足轻重的建筑学与住房的金融化

The Humdrum Architecture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Housing

21世纪初期，既非农村又非城市的景观在中国的热土上不断闪现，又在极短的时间内被高楼大厦代替，这一切的发生都快得令西方发达国家瞠目结舌。库哈斯 (Rem Koolhaas) 在他主编的研究珠三角地区的图文集《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 中称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塑料都市主义”(Plastic Urbanism)，他认为决绝抛弃现状所建造的是一种“没有都市性的都市情境”(Urban Condition Free of Urbanity)——人们的生活方式演变还来不及和城市环境契合。

政府求进、资本逐利。房地产的强盛态势必然要同与之匹配的建设方式结合。以往从西方移植的、

精雕细磨的建筑设计策略显然承受不住这样的进度要求和成本控制。建筑师们惊讶地发现，建筑与资本、速度、数量媾和的结果，是建筑物的大有可为，和建筑学的无足轻重。

经过多年探索，地产商已摸索出一套成熟完整的住宅设计策略，即以场地“强排”为出发点，通过快速的总平面布局设计，测算投资回报率，为营销策划和产品定位做论证。“强排”，即最高盈利强度排布建筑总图，并不是一种空间设计手法，也不是用户需求分析，而是单纯从法律规范和商业逻辑出发的空间生产思路。久而久之，建筑的产出就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至于总平规划完成后的单体建筑平面布局，则多从以往成功的项目中拿来即用，以实现高周转。所以判断一个住宅建筑师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强排能力和出图效率，而非建筑学意义上对体量、尺度、空间的把控，更不用提探索性的空间理念和创新型的功能。

建筑学的无足轻重还体现在立面设计的来路不明。现代主义和建构理论所强调的材料真实、结构真实的设计准则在住宅设计中毫无用武之地。为了迎合大众通俗审美，这些住宅的立面往往直接提取异域风情或中式风格的建筑语汇，甚至以毫无根据的方式融合，俨然一种新世纪“折衷主义”。因而表皮与平面成了完全脱系的两个部分：平面实现户型需求；表皮的形象渲染出品质生活的图景。配合以人工景观和小

区绿化，这些横空出世的“xx花园”、“xx名苑”、“xx新城”，绝不会羞赧于自己千篇一律的建筑空间，而大方地以“欧陆风情”、“山水园林”等说法作为营销概念，以区域地段、自然生态、配套设施作为议价策略，高声呼喊、催促消费者出手。

与之同步发生的，是住房的金融属性逐渐超越了使用属性。2019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近40平米。这个统计数据看似很高，但其中是否分清了空置、投资的房产？显然，还有很多年轻人无法负担住房，也有上亿人正以“房奴”的身份拼命努力。然而过分统一的市场标准和价值判断让人们别无选择——从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从二手房到新房、从小面积到大平层、从一梯多户到一梯一户……价格以让人望而却步的趋势激增，手握多套房产者坐收利润，年轻人奋斗的终极目标依旧是在一二线城市新区高层板楼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火柴盒”。住宅金融属性过强的一个悲剧结果，就是它无法保持作为“居所”的本来用途，而成了有产阶级敛财致富的工具。

客观地看，由商业法则所催生的住宅楼房，虽如出一辙，但也在效率和品质之间摸索到了一条切实可行之道，为来不及应对风云变幻的百姓提供了对“家”的标准化答案，让人们在时代洪流中获得一份安定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库哈斯所提“塑料都市主义”概念内含的单纯贬义是有失偏颇的——所谓的“都市性”未必不能顶着城市建设的巨浪姗姗来迟。

然而，这个在历史上被证明正确的答案，并不能面向未来——巨大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让我们以为别无他法，让我们误会“家”只有单一的诠释方式、叫“住宅”的建筑物只有几种样式，所有人只能向着一个早已被异化了的目标努力。然而，这种诠释方式必然会被新时期演进出来的新问题列为无效答案：实现了大幅度物质增长后，人们的需求逐渐改变，对住宅的态度和理想也必然改变。住宅的新定义亟待被发掘，让人们从旧价值判断体系中走出来，去寻找适合自我的解答。

户型的偏执 Floorplan Paranoia

中国购房者对户型有着极大的偏执。一对年轻新婚夫妻对婚房的要求，南北通透、房型中正正是基本前提；动静分区、三房两卫、干湿分离、中西双厨则是判断户型好坏的标准参数；加之中国人来历已久的“风水”和传统文化考虑，也增加很多额外要求：入户门不能直接对房间、卫生间不宜连着厨房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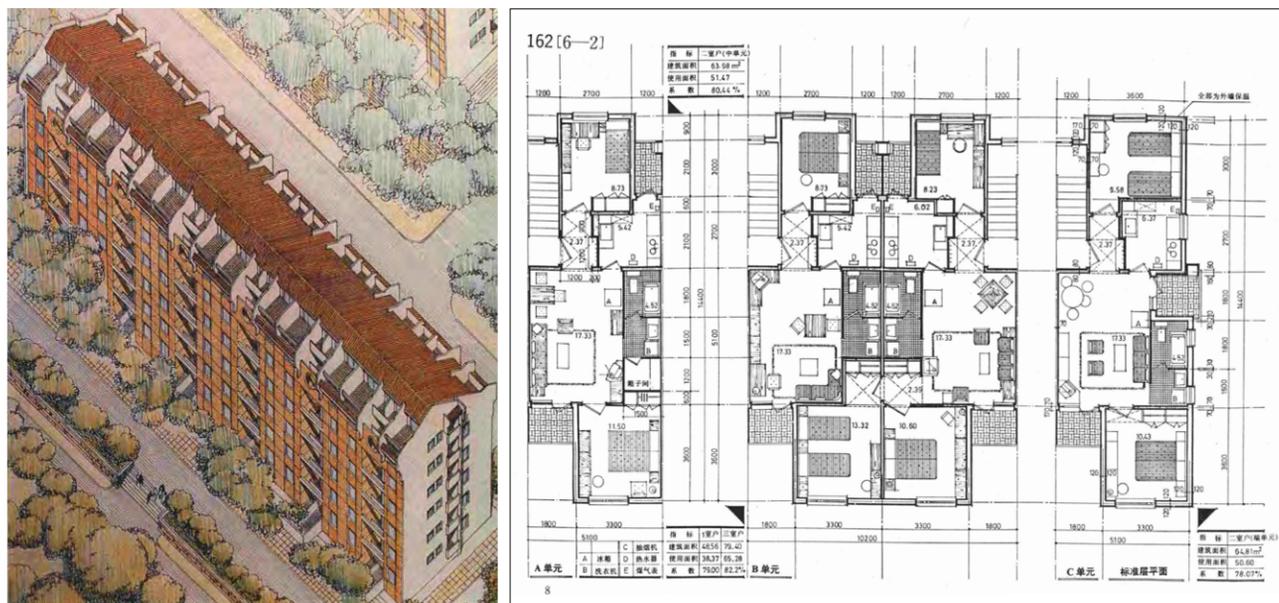
由此应运而生的“小三房”就是面向这样需求的人群。“小三房”指的是建筑面积70-90平米、紧凑地填入三个房间、但总价相对较低的户型。由于户小房多，放置家具后，行动空间非常有限。甚至有开发商为了以“大房间”作为卖点，会刻意压缩客厅开间而把面积分给房间，以至于有些户型的家具必须定制才能合适。

高端产品中，中式合院是前几年较为流行、近些年逐渐泛滥的形式。以“复兴传统”作为依凭，合院提取了传统民居围合的结构，并配合以中部的庭院，私密性与开放性兼备，因此受到较多追捧。但不难发现，市场上大部分合院产品的室内依旧按照“N室N厅”的传统户型思路——空间品质上同其他类型别无二致；而大肆采用“园林造景”、“宅院礼序”概念的中式庭院往往重设计、轻体验，追求“气派”而止于视觉趣味，不免令人易于倦怠。

我们可以从国人对户型的偏执中理解出某种难以扭转的定式思维：人们选购住宅时并非首先思考“我要什么”，而是要求“别的房子有的，我的房子也要有”，同时还想要照顾到可能上门的父母、亲戚、朋友，可能面对的琐碎家务、可能来自客人对房子的评价……考虑了如此多的“可能”，唯独没有照顾自己在使用房屋时本可以享受到的趣味性和丰富性。因此户型成为了判断设计优劣的集体共识，放弃了多样性带来的个性化结果，转而寻找栖息之所的过程割裂为一条条“户型指标”，非要在每条后面打上“已符合”的对钩才能安心落意。

而对地产行业来说，消费者对户型的定式思维使其在进行强排和平面布局时有了来自客户的统一评判标准。因此某种意义上说，高度趋同的住宅建筑的体量和布局生成法则其实是消费者与开发商共谋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唯一被束之高阁的角色便是建筑师。如上文所述，住宅建筑师的身份被异化了成了一个整合各种参数的工具，而这些参数正是来自于效率、回报率、“标准”户型的条条框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建筑师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的职业价值，因为机器最擅长的便是以逻辑计算的方式整合参数，从而输出最优解——若住宅建筑师的工作内容不断被动退守到如此机械化操作的境地，那么被机器取代只是时间问题。

这种前端市场和末端用户之间东鸣西应的现况，不免让人联想到查尔斯·詹克斯 (Charles Jencks) 在《后现代建筑语言》中所说的“建筑学的危机”：设计的结果是某种“基于速度和效用的经验公式 (Proven Formulae)”产生的，“是按不露面的开发者利益，为



“1993年北京市优秀住宅设计方案”一等奖，“六彩方案”(图片来源/《1993年北京市优秀住宅设计方案选编》)
“Six Color Plan”, the first prize winner of “1993 Beijing Outstanding Residential Design Plan”. (Image Source / Selected Residential Design Plan of Beijing, 1993)



市面上千篇一律的“小三房”户型平面图。(制图/作者自绘)
The Similar "Small Three-Bedroom" Floor Plan On The Market.
(Drawing / Author)



杭州绿城江南里别墅。(图片来源/T.K.CHUDesign)
Hangzhou Greentown Jiangnanli Villa. (Image Source / T.K.CHUDesign)



中国台湾22平米的公寓，采用夹层和可重组的家具充分利用空间。(图片来源/A Little Design)
A 22-square meter apartment in Taiwan, China, with mezzanine levels and reconfigurable furniture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space. (Image Source / A Little Design)



缺席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制造的，并假设这些使用者的品味一定是一些陈词滥调 (Cliched)。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极度单一的形式主义和粗略大意的象征主义”。对当今的住宅设计而言，若能摆脱“经验公式”和对使用者品味的刻板印象，转而根据当下的生活情景，设计师是有可能归纳出人们当代日常活动特异性的——这些新时代需求可以被作为空间操作的出发点，引入已经僵化的户型思考中。

看似不标准的户型和房型对特定人群会具有独特的意义：只有一个或两个卧室但每个房间空间充足的小户型未必不受长期独居人士或丁克家庭青睐、大开间+多个小房间的布局适合在家办公或朋友合租的生活方式、不得已而为之的暗室可以布置成家庭影院或发烧友的听音室；惯常的户型认知可能被更先进的建

筑设备和电器改变：良好的主动排气除湿系统让无窗卫生间没有那么难以接受、洗碗机和烘干机的普及让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太大的厨房和阳台用于晾晒；更具特色的空间也许能为生活带来更有活力的体验：看似无用的走廊能成为孩子绘画玩耍的天地、二层挑高的客厅能让位于房间和公共空间的人发生有趣的对话、看似面积过小的房间不妨作为个人独处或冥想的私人空间。摆脱对户型偏执的心理痼疾、不以成型的评价标准判定优劣，才能让“家”这个本就私人化的概念重获新生。

如今，中国住宅的建设已进入存量时代，地产商的开发速度不得降下来，也意味着开发方式必须更为精确细致，从而营造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最简单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生产独具特色空间的户型以适应不

同人群选择，打破原本的单一性规则——这或是建筑师可以重新在住宅设计中发挥能量的契机。

室内装修与生活方式 Interior Decoration and Lifestyle

与建筑立面的设计类似，人们对住宅室内装修的想法也多来自于一些体系化的标准模版。欧式、中式、日式、台式……每一个“式”字前的定语基本决定了从硬装到软装、全套的室内设计内容。市面上装修风格类书籍屡见不鲜，随便翻阅一本《X式室内设计风格详解》就似乎能掌握一套室内设计密码。“您想要什么风格？”也成为一些室内设计师面对客户的唯一问题，而无需进一步了解对方。有的装修公司甚至可以提供“做装修，送设计”的服务。客户趋向于接受这种对于装修风格简单化归类的成因或许非常矛盾：很多人对室内设计潜在的创新力不信任，同时又对室内风格之于生活方式的作用心存幻想。

网络上流传着许多负面装修案例，很多户主为了避免设计“翻车”，宁肯在保险的已有风格中做简单抉择，这样至少能保证他们实现已被大众广泛接受的“X式”，而不落入不伦不类的境地；与此同时，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室内装修风格选择能够代表主人的生活趣味、甚至营造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欧式意味着典雅，日式代表着极简，中式象征着积淀——但事实并非如此。风格化的表浅装饰是某种特定语汇的堆砌，但日常生活的琐碎终将消解掉刻意呈现的风格外衣。无论是在墙壁上贴上多层石膏线装饰的欧式护墙板，还是仅仅做极简的踢脚线，都不会改变我们在已确定的户型内使用特定空间的方式——定义家庭日常活动的依旧是沙发、茶几、电视机组成的客厅，一张

桌子、一套柜子的书房，以及各有一张床和一组衣柜的几个房间。略显讽刺的是，我们在经典欧式风的书房内最常使用的仅仅是一张折叠沙发床；即使躺在客厅沙发上也只是用手机浏览短视频，而非打开嵌在精致背景墙里的电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装修细节和家具软装对于住宅室内并不重要，但它们更为重要的角色是配合空间本身的特征——因为真正能够参与到生活方式形成的元素，恰恰是空间。

伊东丰雄为丈夫亡故的妹妹设计的私宅“中野本町之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是一个形式非常简单的房子——U型体块包围着中部开放的庭院。连续的U型室内空间意味着生活场景的流动变化；当望向或者走入庭院后，沉静的纪念性空间则将活动停滞下来。这个项目的面积很小，小至每一个家具的形状和摆放、灯光的位置和角度都由设计师经过精心设计，加之建筑大面积使用白色，以及柔和曲线的墙面，所有元素都配合在一起，达成了伊东想要实现的流动感，“白色持续唤起白色，曲面一直唤起曲面”。

也许我们会认为中野本町之家呈现的结果太过于实验性，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世俗生活的常轨而趋于艺术化。但这一案例展示了住宅空间如何回应使用者精神上的渴求——如果我们能从自己真正的生活方式中归纳使用特征，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以此为基础信息反推空间形成的策略，再以相宜的室内材质和家具与空间呼应，“家”的精神内涵就会变得可以感知。

当下，存量时代的到来迫使地产行业的开发模式从短平快转向精耕细作；“停建封闭小区”、“住房不炒”等新政策的不断涌现让人们意识到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将逐渐改变……不断更替的大环境让中国住宅更需要更着眼于现状，提出符合当下性的解法。



各种客厅设计参考图例，风格不同，空间一致。
Various living room design, with varying styles but consistent space.



中野本町之家, 1976, 伊东丰雄设计。(图片来源/伊东丰雄建筑设计事务所)
White U, 1976, Designed by Toyo Ito (Image Source / Toyo Ito & Associates, Architects)

重拾建筑学的当下性

Re-emphasize the Contemporariness of Architecture

正如开篇提到的,令人兴奋雀跃的大规模建设已被证明曾经正确,但如今负面效应激增。无论是否反思,高密度的都市环境早已席卷一切,批判来不及提出,宣言没时间发表。而在此时介入,企图将交由政治、经济、市场产生的“无意识的”设计法则归纳综合,并提出具有建筑学意识的“下一步”是异常困难的。

值得警惕的是,久而久之,大众开始无法信任建筑学的专业性带来的价值。由综艺节目《梦想改造家》引发的村民房屋百万造价与审美的争议便可见一斑:所谓的精英文化格调和广泛的通俗趣味之间的博弈早已成了当代最火热的价值观交锋,而住宅这样的通俗产品显然是这种对抗的主要战地。这也是为何在其他类型的建筑项目中可被言说的理论根据和审美情趣,在嫁接到住宅建筑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反应。因此很多建筑师宁肯设计独树一帜的售楼中心,也不设计雷同一律的住宅楼房。

这一困境的本质在于:住宅问题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仍是民生问题,企图用设计策略来解决不免捉襟见肘。但这并不意味着设计毫无作用可言:在大方向确定、决策落实、实体化的过程开始以后,设计师必须以专业的态度,在给出的条件下探索最优答案,并且应该自信这些答案能够为人们的住宅理念提供新的观法——建筑师们应笃信设计对于住宅而言依然有意义,即使这个意义的重建过程极其漫长。

显而易见的是,一直强调自身文化属性的建筑学正在和政治、经济、市场相互缠绕纠缠着走向前路不明的模糊方向,而建筑师们也许只有先走入这重迷雾,并以此深刻自观、反思自己的职业,才可能达到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性——与其滔滔不绝地向圈外劝导如何摆脱西方影响、如何复兴历史传统、如何唤起大众审美,不如先思考建筑学如何同中国当代文化重新实现内在关联更为实际有效。如果住宅需要更加关注未来的可能性,那么建筑学就需要更加关注切实的当下性——如何从因循守旧的“成功”模式中跳脱,转而创造多样化 (Variety)、高灵活度 (Flexibility)、高宽容度 (Tolerance) 的住宅产品,去适应使用者必将展露的个性化需求。●

未来住宅的可能模式 Potential Mode For Future Housing

1 “开放社区”与“混合使用” Open Community & Mixed Use

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规划建设意见中提出“原则上不再建封闭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也要逐步打开”。但在实际操作中,出于安全、管理等考量,小区开放的阻力重重。如何在“镣铐”下进行突破,需要建筑师发挥智慧。



MAD的百子湾公租房(燕保·百湾家园)项目是一次较为大胆尝试。采用“开放街区”、“立体社区”的概念,将首层临街空间作为生活服务配套,引入咖啡店、便利店、餐厅、幼儿园、诊所等功能;二层利用一个环形跑道将街区连在一起,并置入健身房、游乐场、服务中心等面向社区的半公开功能。(图片来源/MAD建筑事务所)

2 公寓楼内的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 in Apartment

对高密度城市而言,额外的公共空间似乎是对住房数量的浪费,但其优势往往被人忽略。公寓楼不仅是用以居住的物质载体,更是社区氛围的容器,而公共空间具有促进社区融合的重要意义。



印度浦那“未来之塔”和塔内对居民开放的彩色“洞穴”。MVRDV在印度浦那的项目“未来之塔”是一座容纳了1068套公寓的巨型建筑。在安排完要求的单元数后,公寓内置入了多样性的公共功能:倾斜的屋顶提供了每层都能享受阳光的露天平台;立面上安置了一些敞开的“洞穴”。这些露台是邻里相聚、活动的空间,增添了“楼内共享”属性。

3 反户型——室内空间的重构 Anti-Type-Reconstruction of Interior Space

解除对户型的偏执,是迈向新型生活方式的第一步。一方面,若社区提供更多的共享功能,很多活动就没有必要非在家中完成。同时,新兴行业、个人兴趣的多样化,具有特殊功能的室内空间也会面临需求。



WJ Design 万境设计的合山境项目,在挑高较高的地下室安排了一个跃层空间,二层通高的开间被作为设计工作室。此外,还配备了一间冲洗照片用的暗房以回应摄影爱好。(图片来源/WJ Design 万境设计)

4 建筑的功能转化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Architecture

存量时代中,旧楼回收改造、功能替换、以及“二手房”的翻修显然会成为重要的方向。



Misa Studio是一个在两座旧厂房仓库之间、轻质钢结构顶棚下“嵌入”的住宅。(图片来源/WJ Design 万境设计)



华盛顿的赫克特厂房 (Hecht Company Warehouse) 是一座建于1937年的摩登流线风格 (Streamline Moderne) 建筑,原功能是汽车维修和装配。2016年,保护性改建为一座零售和居住混合的公寓楼,包含300个套间。新立面与1950年代的厂房外立面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图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西班牙 Piano Piano Studio 在2020年的 Pelayo 公寓室内改造设计中,将原本中部的黑暗走廊替换为一个连通周围空间的八角形中部“关节”。虽然房间规整程度有所下降,但各个空间形成了多个方向的对话轴线。(图片来源/Piano Piano Studio)



赫克特厂房公寓内,面积最大的角落套间 (Corner Unit)。从空间尺度和裸露的结构上来看,这甚至不像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住宅。因原结构造成的诸多限制,使得公寓内的每一个户型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相比于推倒重建,改造的造价较为低廉,也受到年轻人喜爱。(图片来源/hechtwarehouse.com)

向我们的下一代学习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呼唤对 儿童需求与城乡发展规律的本质探究

Learning from Our Next Generation:

Child-Friendly City Construction Calling for
Exploration of Children's Need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Law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这一数据揭示出目前我国儿童的成长环境亟待进一步改善，现状还不利于发展儿童积极健康的身心状态。在我国目前面临的“少子化”的客观状况下，营造“儿童友好型城市”更有其现实意义。

1996年，“儿童友好型城市”(Child Friendly Cities, CFC)由联合国第二次人居环境会议提出，旨在全球范围内为儿童营造美好城市和成长环境。该理念认为，各国在城市空间规划中应尊重和维护儿童的发展权利，为培养儿童积极健康的心理、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而构建更加适合儿童成长的城市。“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提出源于其历史背景下城市化的发展，也体现了当时国际层面对于儿童权利的关注。从内涵上来看，儿童友好型城市主要包含政策友好、服务友好、人文友好与环境友好。同时，儿童友好不仅仅是对儿童的友好，也涉及全龄段友好的社会氛围，儿童友好应是一个囊括其监护人、社区、社会、大自然的更全面联结的概念。

在世界范围，联合国儿童友好城市计划(CFCI)目前已深入40余个国家、近3000个城市。在中国，长沙市与深圳市率先提出了“儿童友好型城市”口号，并将其纳入了各自的十三五规划、2050远景发展战略规划等计划中；在其他城市(如北京、上海、成都等)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探索。2021年3月，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被纳入“十四五”规划，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正在加入这一行动。2021年10月，国家发

展改革委办公厅等23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到2035年，预计全国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超过50%，100个左右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儿童友好城市”等目标。中国正在逐渐形成结合顶层设计引导与地方城市实践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模式。

比较中国与海外城市，由于城市的发展脉络、基础条件、所面临具体问题存在差异，在对“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理解与建设措施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所取得的成果也各有千秋。最早提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欧美发达国家从倡导儿童游戏权的初衷出发，在处理城市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上，积累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经验。一些后发国家与地区(如日本、韩国、香港等)则积累了大量应对“少子化”、更大规模的城市化所带来儿童发展问题的经验，一定程度上也值得中国进行参考借鉴。不过，由于中国广袤的国土及地域发展不平衡性，国外的经验无法直接搬照。《城市中国》第92期希望既从海外经验中发现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部分，又能从我国的在地实践中挖掘值得被放大的经验，为未来更多的儿童友好型城市落地提供案例参考。

儿童是社会的未来，最大的儿童友好根植于对“家庭”友好，需要整个社会系统性的意识与行动变革。本期针对“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讨论，从儿童友好的国际视野、城市规划、自然空间配置、儿童游戏与游戏场、家庭教育、住宅设计、出行性教育、社区规划、老幼融合、可持续设计、儿童参与、儿童与灾害预防等方面展开。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梳理，集中呈现了符合“可玩性”与安全需求并对监护人友好的理念如何在不同尺度空间上体现，在社区功能与服务的提供中如何做好儿童与家庭的身心健康建设，特殊条件下如何应对儿童面临的潜在灾害等议题。同时，我们进行了上海市世代儿童自然游戏的调研，将会整理成别册，一方面试图再现城市化对儿童游戏的影响，另一方面希望过去基于自然的游戏可以在新时代被保留与传承。

我们期待在儿童与城市化的动态关系中，研究者与规划师能以小见大来分析儿童的需求以及城乡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不同维度、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与规划愿景，助力今后的儿童成长与发展。●

儿童友好型城市时间轴

Timeline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 儿童友好型城市：

1.“儿童友好型城市”是指致力于实现《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权利的城市、城镇、社区或任何地方政府、体系；在这些城市或社区，儿童的心声、需求、优先事项和权利是当地公共政策、程序、决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儿童友好型城市是适合所有人栖身的城市。

2.“儿童友好型城市”是指致力于为儿童提供下列基本保障的城市或社区

- 人身安全有保障，免受剥削、暴力和虐待；
- 人生有良好的开端，健康成长，备受关怀；
- 能获得基本服务；
- 能享有优质、全纳、参与式的教育和技能培训；
- 能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意见并影响相关决策；
- 能参与家庭、文化、城市/社区和社会生活；
- 能生活在清洁、无污染、安全、有绿化空间的环境中；
- 能与朋友见面，有地方供他们玩耍和娱乐；
- 不论种族、宗教、收入、性别、能力，都能拥有平等的机会。

● 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

1. 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导的倡议活动，旨在支持城市和社区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和儿童友好型社区。不仅如此，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也是一个能将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联结在一起的网路，如：有志提升所在城市和社区儿童友好程度的公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学术机构、传媒机构、儿童组织和以儿童为主导的组织。其中，最后两类组织最为重要。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建设地方利益相关方的能力，确保为儿童带来可持续的成果，不遗余力地促进儿童权利”。所以，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其目标并不是要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的第一个项目周期内落实五大目标，而是要循序渐进地，带来切实成果，并在此后的项目周期中，不断拓宽目标范围。

2. 创建和管理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

虽然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的结构因国家而异，但最好涉及以下几个步骤：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各国办事处或国家委员会与地方政府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签署谅解备忘录；
- 开展儿童权利现状分析，确立基线并对照基线监测工作进展；
- 制定并通过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行动计划，明确定义获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可，成为儿童友好型城市所需达到的结果、指标及明确标准；
- 进入实施阶段；
- 制定监测和评估框架；
- 城市或社区获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正式认可，成为儿童友好型城市/社区后，即有权在约定期限内(1-5年)享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的成员身份。

(根据2019年5月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和社区手册》)



● 19世纪中后期

美国工业、制造业迅速发展，城市公共服务无法匹配市民生活，儿童没有玩耍空间。一些城市颁布《街道条例》禁止儿童在街道上玩耍。同时，一些教育学家认为玩耍有教育意义，城市需要给儿童提供玩耍空间。由此爆发了美国游戏场运动(The Playground Movement)，对美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游戏场运动之父”约瑟夫·李于1882年在波士顿做调查时看到一群男孩因在街上玩耍被捕，他用纸盒、木板等材料在空地上设置障碍物，做了一个简易的游戏场，来这里玩的孩子都很珍惜，并主动承担起了维护游戏场的责任。地方政府受到启发，1889年，马萨诸塞州的卫生协会在波士顿西区贫民窟建设了一块占地4000平方米的游戏场，该场地由棒球场、沙坑、游泳池和儿童设施组成，并免费向儿童开放。1906年，一群教育界人士在华盛顿正式创立美国游戏场协会组织，推动游戏场立法，总结游戏场运营经验，并通过《游戏场》杂志传至全国各地。截至1930年，美国共计39个州修订了游戏场相关法律，其中的22个州在教育局内增添了专门职位来督察地方游戏场的设立。

● 1920年代

美国游戏场运动(The Playground Movement)，涉及教育、社会改革和儿童福利等诸多领域。

● 1940年代

在欧洲兴起的城市冒险游戏场。1943年第一个冒险游戏场在丹麦建成，随后英国景观设计师及儿童权利倡导者艾伦(Allen)将其在英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推广开来。

● 1960年代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牵头的“在城市中成长”(GUIC: Growing Up in the City)一里程碑。GUIC项目是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制定的“在城市中成长”(GUIC)计划的雏形。该项目从1968年开始持续了十年，针对世界上正在经历城市化的多个国家开展城市与儿童发展关系的调查比较研究，如城市化发展给儿童成长带来的弊端、城市环境对儿童各方面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环境纳入公共决策的整合考虑，以及将儿童参与作为重要方法对使用环境的质量进行评估与设计等，目的在于从儿童视角出发研究能满足其需求的优质生活环境。

● 1989年11月20日

第44届联合国大会第25号决议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按照其第49条规定，1990年9月2日正式生效。这是第一部有关保障儿童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约定，适用于18岁以下的任何人，旨在世界各国儿童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我国于1990年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于2006年起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推广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

● 1990年

纽约市立大学罗杰·哈特(Roger A. Hart)教授在《儿童权利公约》生效之际，受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委托，罗杰·哈特对全世界的儿童参与状况进行了调查，整理成了报告。在此背景下，通过儿童友好城市的全球网络，将儿童友好城市倡议(CFCI)纳入政府施策的项目也开始了。

● 1996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以下简称儿基会)与联合国人居署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第二次人类居住会议(Habitat II)上正式提出“儿童友好城市倡议”(CFCI: Child Friendly City Initiatives)，核心是保护儿童的四大权利，建立一个可以听到儿童心声，实现儿童需求、优先权和权利的城市治理体系。儿基会通过其项目实施和国际平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儿童友好城市(社区)”(CFC: Child Friendly City)认证，支持各国的城市及社区开展相关主题的政策制定与城市实践。

● 2021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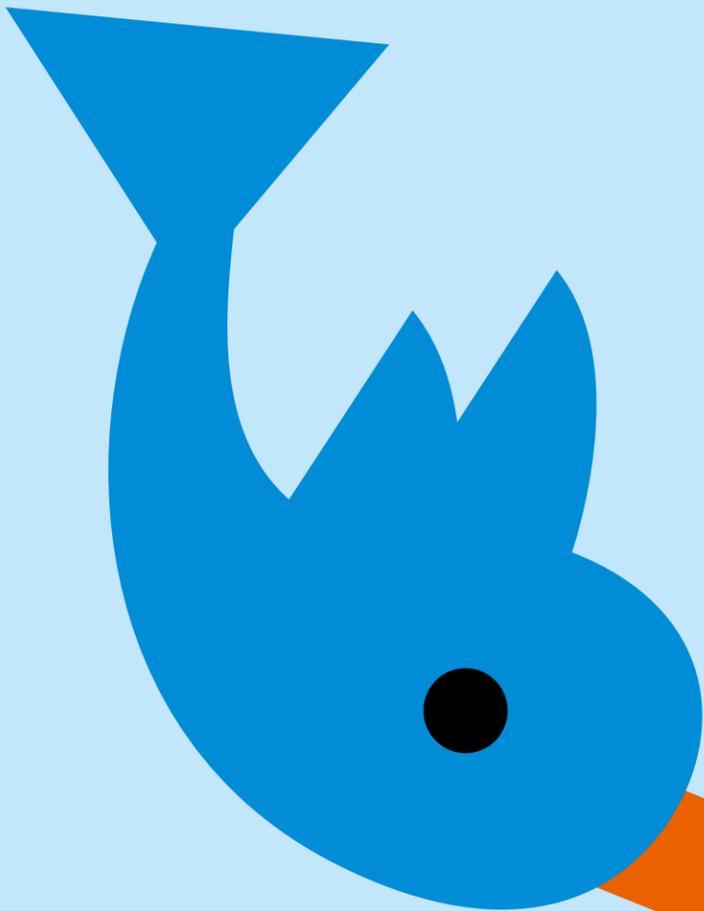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正式写进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

● 2021年10月15日

国家发改委联合22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是继年初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被写进“十四五”规划纲要后的具体推进，提出了明确的建设目标：到2025年，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推动儿童友好理念深入人心；到2035年，预计全国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超过50%，100个左右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儿童友好城市。

● 目前

CFCI(儿童友好城市倡议)已深入40余个国家、近3000个城市。



您的城市是否对儿童友好?

UC 儿童友好型城市现状与建议调查问卷反馈

Is Your City Child-friendly?

Results from UC Questionnaire about Current Condi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Child-friendly Cities

文 / 山冰沁
Text / SHAN Bingqin

随着城市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进，自上世纪以来，儿童在城市中的发展权利不断受到关注。城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境污染、交通安全隐患、贫富差距等问题，限制了儿童在城市中正常的玩耍与出行，同时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在此背景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层面的对于“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关注不断升温。中国也将“儿童友好”写进了“十四五”规划，提出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示范，加强校外活动场所、社区儿童之家建设和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完善儿童公共服务设施，扩容普惠托育服务等措施。

重视儿童友好，需要客观分析与把握儿童在城市中的需求以及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儿童友好不仅仅是对儿童的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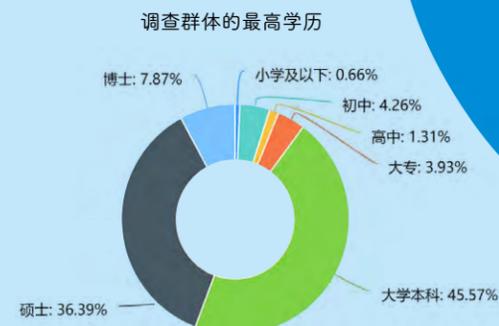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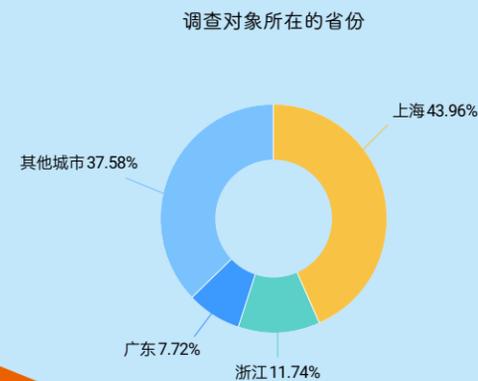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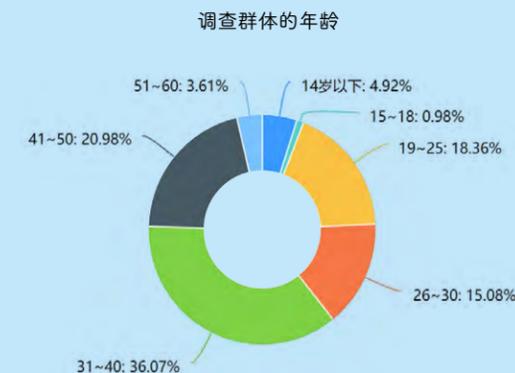
也涉及全龄段友好的社会氛围。从内涵上来说，它可以扩展至一个囊括其监护人、社区、社会、大自然的更全面联结的概念，体现了政策、服务、人文与环境全方位的关怀与友好。

《城市中国》第92期希望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大城市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面的现状，从儿童玩耍空间、儿童友好出行、监护人友好、儿童城市教育等不同维度入手，了解与探讨当下各大城市政策与实践对儿童与城市问题的关注。我们设计了一个问卷，希望从城市居民手中收集第一手信息，分析与对比儿童友好城市相关现状与建议，为研究与讨论提供数据参考与支撑，以期最终向读者呈现更加丰满的叙述与观点。

样本描述 Sample Description

目前我们总共收到了305份答卷。在填写调查问卷的群体中，女性占71.8%，男性占27.87%，第三性别占0.33%，显示出女性对儿童议题具有更高的关注度。从年龄分布上来看，填写最多的为31-40岁群体，共110人，占36.07%。填写问卷的群体中，包含14岁以下的儿童15人，占4.92%；以及15-18岁的未成年人3人，占0.98%。从婚育状况上来看，已婚且有一个子女的群体占比最大，共130人，占42.62%。其次为未婚群体，共117人，占38.36%。从最高学历上来看，大学本科学历群体占比近一半(45.57%)，硕士学历群体(36.39%)与博士学历群体(7.87%)也占有较大比例。因此，填写本调查问卷的受访群体整体学历偏高，显示出高知人群对儿童友好型城市话题的关注度更高，也或与杂志的读者群学历分布有关。本问卷的反馈也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或许更多体现出女性、已婚带一个子女、高知群体的观点。

本次调查的近半数样本来自上海市，共131人，占43.96%，因此本问卷的反馈结果或更多反映上海市现状与需求。



所在地儿童玩耍空间调查 Children's Play Space

在本次调查中，绝大多数填写者住在商品房小区，占74.1%，因此以下关于儿童玩耍空间的反馈或更多体现商品房小区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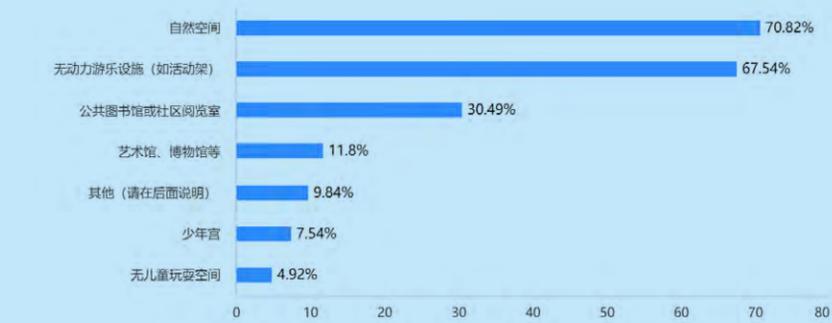
居住地周围最近的儿童玩耍空间在步行5分钟范围的占绝大多数，达64.26%，体现出较高的儿童玩耍空间可达性。合计在居住地步行15分钟范围内能达到儿童玩耍空间的占92.78%。在“其他”选项中，有的调查对象认为，居住地附近并没有专属的儿童玩耍空间，只要儿童喜欢，这些地方都可供玩耍。

调查对象的15分钟生活圈内占比较大的玩耍空间类型依次为自然空间(70.82%)、无动力游乐设施(67.54%)、公共图书馆或社区阅览室(30.49%)。文化设施(如艺术馆、博物馆)与少年宫较少，无儿童玩耍空间的情况也非常有限。选择“其他”选项的多为“广场”、“商场室内游乐设施”等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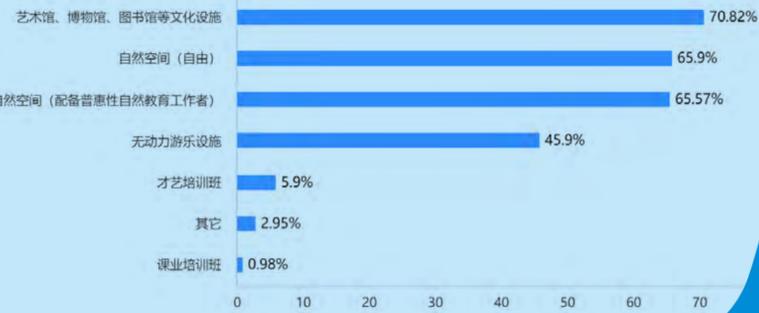
调查对象最希望儿童玩耍的空间为艺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70.82%)、自然空间(自由)(65.9%)、自然空间(配备普惠性自然教育工作者)(65.57%)、无动力游乐设施(45.9%)。才艺培训班与课业培训班占比较低。在“其他”选项中，不少调查对象提到希望儿童在体育运动空间(如篮球场、沙坑、带体育设施的自然空间、社区专业体育设施及遮阳场所等)中玩耍。

绝大多数(79.34%)调查对象的15分钟生活圈内儿童玩耍空间不收费，仅2.62%表示收费。“有一部分收费，一部分免费”的情况占18.03%，主要为自然空间、图书馆、博物馆、无动力游乐设施等公共设施免费，商场部分游乐与体育设施收费，少年宫、私人培训机构等培训设施收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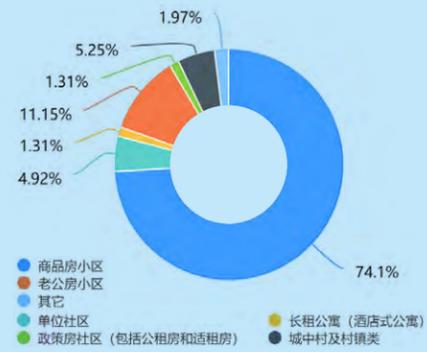
15分钟生活圈内的儿童玩耍空间的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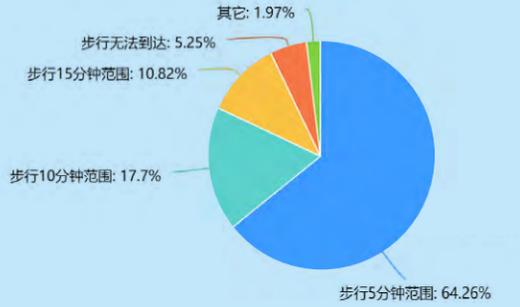
调查群体希望儿童在怎样的空间中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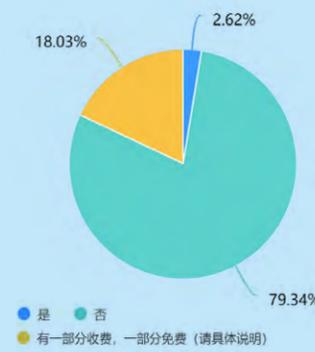
调查群体居住的社区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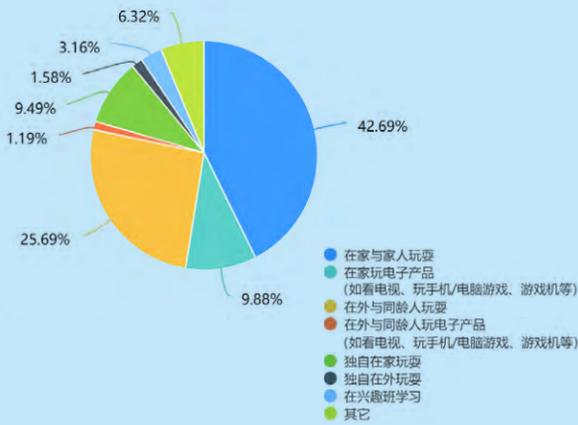
调查群体居住地周围最近的儿童玩耍空间的距离范围



15分钟生活圈内的儿童玩耍空间是否收费



0-6岁儿童大多数时间以何种方式玩耍



限制调查群体15分钟生活圈内儿童玩耍与社交的主要原因



7-14岁儿童的课余时间大多以何种方式度过



限制调查对象15分钟生活圈内儿童玩耍与社交的主要原因依次为：缺乏适合儿童的文化艺术空间(47.54%)、缺乏儿童游乐的硬件设施(42.3%)、交通安全隐患(38.36%)、缺乏自然空间(35.41%)、儿童课业压力大(34.1%)、同龄人玩伴少(24.26%)、儿童活动空间周围没有配备监护人社交空间(23.28%)、家长对儿童游戏的接受度及过度保护倾向(21.64%)、治安问题(13.77%)、公共空间被其他年龄层群体挤占(9.18%)、其他(4.59%)、玩耍与社交空间非免费或收费高(4.26%)。以上结果反映出样本对合适的文化艺术空间、游乐设施与自然空间的需求，以及对交通安全隐患的担忧。

其中，“公共空间被其他年龄层群体挤占”选项中，挤占儿童玩耍与社交空间的群体主要为老年人(多为广场舞爱好者)、商场密集的人流以及遛狗不拴狗绳的群体。“其他”选项中，反映最多的是“大人没有时间陪伴”。

在调查对象的反馈中，0-6岁儿童大多数时间主要在家与家人玩耍(42.69%)，其次为在外与同龄人玩耍(25.69%)。在家玩电子产品(9.88%)及独自在家玩耍(9.49%)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一结果说明大多数0-6岁儿童在家玩耍的情况占大多数。

在调查对象的反馈中，7-14岁儿童的课余时间大多“做完作业，在外与同龄人玩耍”(21.97%)，“做完作业，在家与家人玩耍”(17.38%)，“做完作业，独自或结伴玩电子产品”(12.79%)。“做作业，上培训班”与“作业太多，不玩耍”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培

训班类型中，包含运动、合唱、艺术、舞蹈、自然、戏剧、击剑、声乐、美术等素质拓展培训，更大比例的是语数外等课业培训。在“其他”选项中，提到疫情对儿童玩耍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个别孩子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如做完作业，在家搞小发明）。

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儿童每天应进行1-3小时的户外玩耍时间，其中尤以2小时为多，符合教育部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要求的应有至少2小时户外活动时间。

对于15分钟生活圈内儿童玩耍空间的提升，调查对象的建议大多数集中在增加自然空间、增加活动空间的安全性（规范交通、提升设施安全、提升治安环境）、多用自然材质或自然元素的活动设施、适合多年龄段。

其他提及的有增加艺术感、增加活动空间的连贯性、增加监护人观察等待与社交活动的区域、凝聚社区力量（家长可以轮流看护孩子）、扩大儿童玩耍的场地、增加多样性、增加体育性质的免费游乐设施、提供同龄玩伴社交机会、将图书馆或博物馆等功能与玩耍空间融合、充分利用社区边角空间、设置阶段性主题活动、整洁干净、社区建设体现更多儿童的视角、增加街道等非正式玩耍空间的趣味性。

所在地儿童友好出行调查 Child-friendly Travels

74.1%的调查对象认为儿童有权利独立出行，而剩余25.9%的调查对象认为儿童没有权利独立出行。

在现实中，仅24.92%的调查对象认为其所在城市的儿童能够做到独立出行，剩余75.08%则认为不能。

在一系列限制调查对象所在城市儿童独立出行的因素中，最主要的是交通安全隐患（92.13%）；其次依次为社会治安隐患（65.25%）、儿童安全意识薄弱（58.36%）、空间规划不合理（39.34%）、儿童出行教

育欠缺（39.02%）、在外缺乏针对儿童的指示牌（39.02%）、监护人过度保护与观念保守（34.43%）。在外健康隐患仅占4.59%，其具体的隐患主要包含新冠疫情等传染病、中暑、蚊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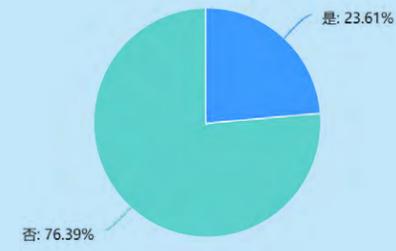
针对15分钟生活圈大多数7-14岁儿童的出行活动中，除出门玩耍外，绝大多数活动（上学；放学；去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设施；购物；去医院；去培训班）均有近50%或超过50%的调查对象认为儿童无法做到独立出行。7-14岁儿童独立出行程度最大的活动为出门玩耍，主要出行方式为步行（63.93%）。其他独立出行程度较高的活动依次为放学、上学、去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设施。其中，上学与放学选择步行的出行方式较多，其次为公共交通；去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设施最主要的出行方式为公共交通，其次为步行。去医院是儿童独立出行程度最小的活动。

在上述无法独立出行的情况中，家长开车是最普遍的方式，尤其在去医院（76.72%）与购物（74.43%）的活动中。家长陪同乘坐公共交通、家长选择汽车以外的其他方式、家长陪同步行也占有一定比例，表现出儿童在无法独立出行的情况下大多与家长结伴而行。除上学、放学后，设施专车的利用非常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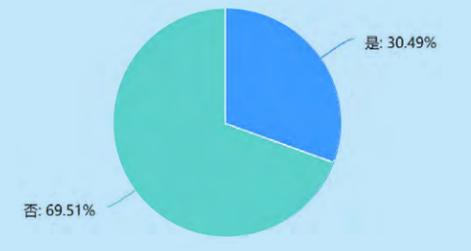
76.39%的调查对象认为所在城市对儿童友好出行不重视，仅23.61%认为重视。

最受调查对象认同的所在城市应重点推出的前5条针对儿童友好出行城市的政策与措施依次为：在儿童活动场所（如学校）周边设置限速标志、注意儿童标志、人行横道线等（67.21%）；改善儿童过街，如在儿童通学路段上对机动车、非机动车限速，增加过街警示标语、彩色路面、符合儿童趣味的喷涂等（66.89%）；压缩社区、儿童活动场所周边的机动车空间，提升步行与非机动车出行环境，对机动车停放进行规范（51.48%）；加强社区安全保障与执法，如增加安保、合理设置夜间照明、增强对公共设施维护与管理等（51.48%）；将社区内部一部分空间用于室外活动场地、儿童游乐设施用地（44.59%）。

调查群体认为所在城市是否对儿童友好出行重视



调查群体认为所在城市是否在公共场所配备足够的母婴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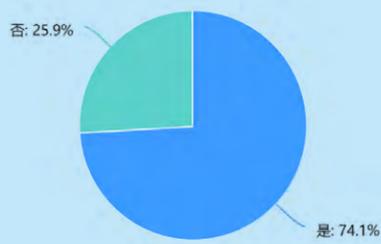
调查群体认为其所在城市应重点推出的针对儿童友好出行城市的政策与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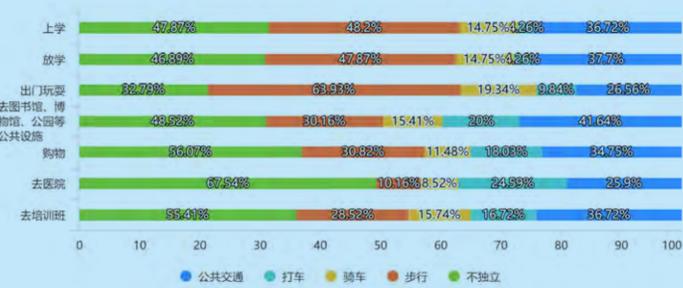
调查群体认为所在城市公共场所的母婴室主要存在的问题



调查群体认为儿童是否有权利独立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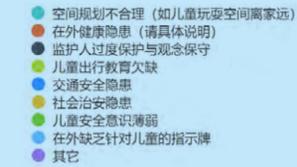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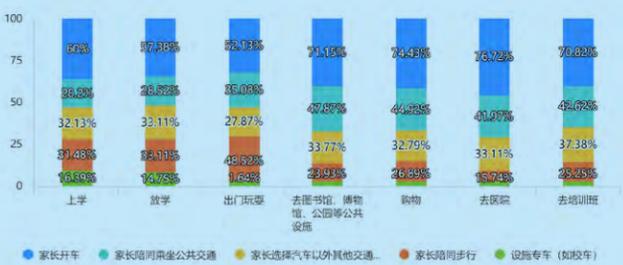
调查群体15分钟生活圈大多数7-14岁儿童一般选择何种交通工具“独立”进行下述活动



限制调查群体所在城市儿童独立出行的主要因素



上述“不独立”的情况中，儿童一般如何出行



所在地儿童监护人友好情况调查 Children's Guardian-friendliness

69.51%的调查对象认为所在城市公共场所没有配备足够的母婴室，其他30.49%则认为足够。

调查对象认为所在城市公共场所的母婴室前5大主要存在的问题为：严重缺乏母婴室（36.07%）；除尿布台、洗手池、哺乳椅基础三大件外设施不够丰富（36.07%）；分布不合理、不均匀（34.75%）；空间设计不合理（33.11%）；卫生条件差（32.46%）。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选项中，许多男性调查对象称从未进入过母婴室。由于“母婴室”的名称限制，男性在外带娃较为困难。有一条留言指出，“喂养或照顾婴儿也是整个家庭的责任，‘母婴室’或许可以改名为‘家庭室’”。

34.75%的调查对象认为所在城市的儿童活动区域周边普遍设置监护人等待/社交空间，而更多的（65.25%）调查对象则认为没有普遍设置。

80.33%的调查对象支持将儿童活动空间与其他年龄段活动空间进行融合设计，另外19.67%则不支持。

在调查反馈中，调查对象认为所在城市的儿童活动空间需要融合的其他年龄段群体的活动空间依次为：15-21岁（44.59%）；51-70岁（39.34%）；31-50岁（32.13%）；71岁以上（17.38%）；22-30岁（16.39%）。这反映出调查对象更倾向于让儿童与青少年的活动空间相融合，其次为与祖父母、父母年龄层群体融合。

针对儿童活动空间周围设置监护人等待/活动空间与其他年龄段活动空间进行融合，调查对象的建议比较分散。有一部分人认为应当与老年人群体的活动空间相融合，如少年宫与老年大学融合；也有一部分不支持与老年人群体融合，或认为即使融合也要保持一定距离，不能互相干扰，要有明显的用途与用法划分，或错峰设计，尤其不适合与广场舞群体融合。一部分调查对象认为如果需要融合，要规范场地的成年人行为，如禁烟、禁宠物等。

其他关于监护人等待区域的建议多为：周边配套设施齐全（如遮阳设施与休息区、家长活动区以及很重要的移动保健室、洗手间与母婴室等）；共享自然空间；监护人休息设施开敞、视野开阔，方便看护孩子；增加包容性与互动性设计，如亲子类活动；儿童活动区域与成年人体育健身区域相融合，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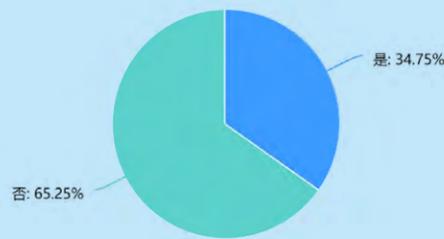
目前，调查对象所在城市最普遍的育儿状况为老人隔代育儿（91.15%）。父母一方全职带娃（37.7%）与付费式托育服务（27.54%）各占一定比例。国家当前大力推广的普惠式托育服务仅占8.52%，远远没有普及。在“其他”选项中，个别调查对象认为“父母双方全职带娃，偶尔请老人来帮忙”也存在。

在填写的85份有效问卷中，0-3岁儿童的监护人每月在托育上的花费平均数为4823.53元，中位数为400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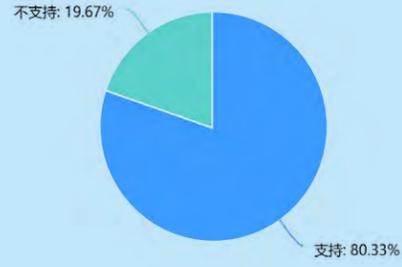
调查对象对公办托育服务和普惠托育服务最希望改善的方面为：每个社区配置多样化的托育服务设施（83.61%）。其次，加强托育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培训也是众所呼吁较高（71.48%）的方面。

在调查中，调查对象认为所在城市还应当增加以下行动来促进儿童与监护人友好：企业分担托育责任，或允许监护人准时下班，尤其是3岁以下儿童托管应和父母工作作适当协调；一方全职，则家庭税收减免；丰富社区公益儿童活动，活动信息更透明；增加家长育儿课程，开展公益育儿讲座，提供育儿攻略（如“周末带娃去哪儿”）；基础设施设计方便婴儿推车无障碍出行，增加儿童推车租赁；社区定期进行“家访慰问”或者电话联络询问家庭教育问题，关注家长与儿童心理健康；让家长假期与儿童假期相匹配；为家庭发放育儿必需品；增加第三厕所，方便爸爸带女儿或妈妈带儿子出行，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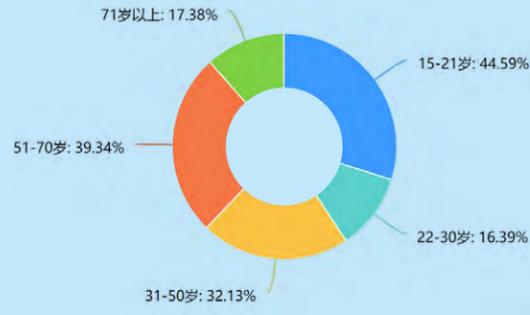
调查群体所在城市的儿童活动区域周边是否普遍设置监护人等待/社交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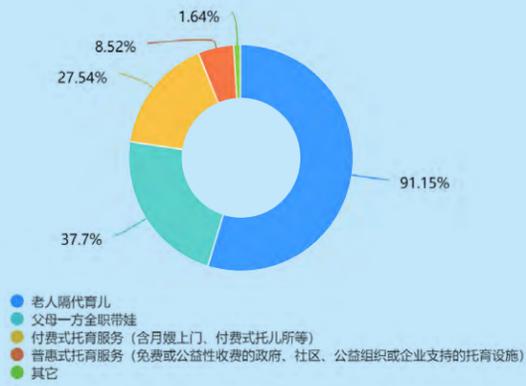
调查群体是否支持将儿童活动空间与其他年龄段活动空间进行融合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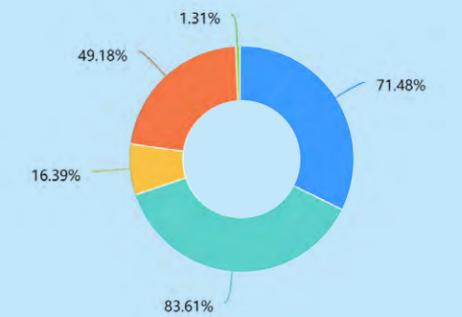
调查群体认为所在城市的儿童活动空间更需要与哪一年龄段群体的活动空间进行融合



调查群体所在城市目前的普遍育儿状况



调查群体对公办托育服务和普惠托育服务最希望改善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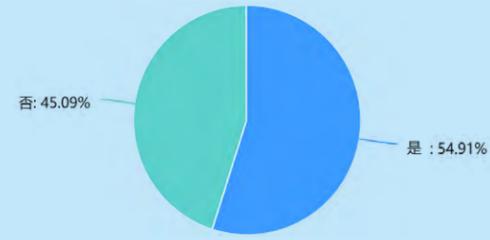
- 加强托育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培训
- 每个社区配置多样化的托育服务设施(含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学校或医院接送陪同等服务)
- 发展互联网直播互动式家庭育儿服务
- 开发婴幼儿养育课程、父母课堂等,定期举办向监护人普及育儿知识的活动
- 其它

所在地儿童城市教育调查 Children's Education about Their C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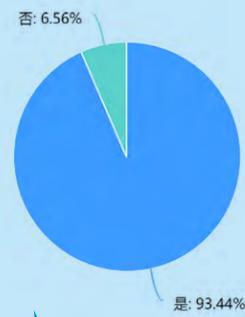
过半（54.91%）的调查对象的子女有途径学习了解所生活城市的历史、发展与规划，大部分通过城市规划展览馆、历史博物馆、文化馆、学校、网络或书籍、纪录片、街道宣传栏等途径学习，结合家长亲自教导，部分公益机构亦提供相关面向儿童的城市类课程。一些调查对象认为单向性输入较多，互动性不足。另外，有45.09%的调查对象认为其子女无法在所生活城市获得有关城市历史、发展与规划的教育。

93.44%的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对儿童进行城市教育，6.56%的调查对象则认为没有必要。

调查群体的孩子是否有一些途径学习了解所生活城市的历史、发展与规划



调查群体认为是否有必要对儿童进行城市教育



一些结论 Conclusions

大部分调查对象居住地附近多为自然空间（口袋公园、公共绿地等）的非儿童专属的玩耍空间，部分配备无动力游乐设施，可达性较好。目前，适合儿童的文化艺术空间（如艺术馆、博物馆）是调查群体反映中需求最大的希望改善的配套设施。此外，尽管自然空间与儿童游乐设施可达性较好，调查群体仍旧希望增加更多自然空间与游乐设施，或许是由于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较高，这些空间与设施单位面积承载的人流过多，难以提供高质量的儿童玩耍体验。

多数6岁以下儿童平时在家玩耍，7-14岁儿童相比而言具有更多户外自由时间，可以在做完作业后与同伴出行，但这一比例并不高。大多数儿童的玩耍过程大多在室内（尤其是家中）进行，玩耍对象多为家人。这一结果显示出家庭环境对儿童成长具有较大影响。

交通安全隐患是制约儿童独立出行的重要因素。在无法独立出行的儿童活动中，家长开车接送是主要的出行方式。调查群体普遍认为所在城市对儿童独立出行并不重视，这一点值得城市规划与政策制定者反思。

目前的城市中，对于监护人母婴室的配备并不重视，条件也不完善，限制了监护人带孩子出行，缩小了儿童的活动范围。同时，大多数儿童玩耍空间附近没有考虑监护人的等待、看护、休息与社交活动等需求，给监护人带来了不便。这些配套设施需要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中之加以完善。

针对儿童活动空间与其他年龄层群体活动空间的融合上，调查群体更倾向于让儿童与青少年的活动空间相融合，其次为与祖父母、父母年龄层群体融合。但是，这一观点上的两极化现象较严重，主要表现为对老年人群体与儿童相融合的支持与反对。在当今中国多为“隔代抚养，老人带娃”的育儿现状下，老年人与儿童的活动空间如何融合或许需要更多的制度与设计考虑。调查群体普遍认为，即便是不同年龄层群体可以与儿童活动空间相融合，依旧要保持适当距离，留有缓冲余地，或配合更完善的亲子活动设计，这些需求需要在未来儿童活动空间的服务设计上做更详尽的调查与推敲。

调查群体普遍呼吁实现普惠式托育，为此政府应当配套更完善的政策，充分方便监护人养护儿童。同时，对于托育机构的专业人员培训、父母的家庭教育与育儿指导等，也应当提供更全方位的社会支持。未来，社区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或许应当具备更多相应的功能。

儿童对城市的理解多来自成年人通过城市规划展览馆、历史博物馆等设施输出。总体来说，绝大多数调查群体肯定了儿童城市问题教育的必要性，而城市类教育在现今的普遍性尚有欠缺，互动性不足，依赖未来更专业、更普及的配套服务设置。



Learning From Our Next Generation

Child Friendly City Construction Calls for Study on the Essence of Children's Needs an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al Law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n National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in China (2019-2020)*,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China is 24.6%, of which 7.4% are severely depressed. This data reveals that children growth environment in China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not friend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healthy physical and mental conditions. Under the scenario of low birthrate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initiate "Child-Friendly Cities".

In 1996, Child Friendly Cities (CFC) was proposed by the Secon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 aiming to create better city and growing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worldwide. This concept holds that countries should respect and safeguard children's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urban spatial planning, and build cities that are more suitable for children's growth in order to cultivate a positive and healthy mentality and a correct world view. The proposal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stem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also reflects the international concern for children's rights at that time.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Child-Friendly Cities mainly includes policy-friendly, service-friendly, human-friendly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Meanwhile, child-friendliness is not only friendly to children, but also involves a friendly social atmosphere for all ages. Child-friendliness should be a more comprehensive concept that includes the guardian, community, society, and nature.

Worldwide, the United Nations Child Friendly Cities Initiative (CFCI) has reached more than 40 countries and nearly 3,000 cities. In China, the City of Changsha and Shenzhen have taken the lead in introducing the slogan "Child-Friendly Cities" and have incorporated it into their respectiv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2050 Visionary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other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Chengdu, etc.) have also explored it to varying degrees. In March 2021, the a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construction was put down into the national 14th Five-Year Plan, and more Chinese cities are joining the initiative. In October 2021, 23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including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jointly issued the *Guidance on Promoting Child-Friendly Cities*, proposing that "by 2025, 100 pilot child-friendly cities will be built nationwide; by 2035, it is expected that more than 50% of cit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one million will be child-friendly cities, and approximately 100 cities will be named national child-friendly cities". China is gradually forming a model of child-friendly city construction that combines top-level design guidance with local practice.

Comparing Chinese and overseas citie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basic conditions, and specific problems faced by cities,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nstruction measures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so the results achieved are variou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which first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dealing

with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nature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advocating children's right to play. Som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Japan, South Korea, Hong Kong, etc.,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the developmental problems of children brought about by low birthrate and large-scale urbanization, which is also worthy of reference in China to some extent. However, due to the vast territory and the uneven reg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foreign experiences cannot be directly replicated. The 92nd issue of *Urban China* hopes to find out not only w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overseas experiences, but also w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its local practices, so as to provide case studies for child-friendly city implementation in the future.

Children are the future of society. The greatest child-friendliness is rooted in family-friendliness, which requires systemic changes in awareness and action across society. In this issue, the discussion on "Child-Friendly Cities" star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child-friendly, urban planning, natural space configuration, children's games and playgrounds, family education, housing design, mobility education, community planning, integration of the old and the young, sustainable design,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and children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Through the review of specific cases, we focus on how to meet the needs of "playability" and safety and guardian-friendly concepts in different scales of space, how to buil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the provision of community functions and services,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potential disasters faced by children under special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we conducted a study on children's nature games in Shanghai for generations and will compile it into a supplement, trying to reproduce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children's games on the one hand, and hoping that the nature-based games of the past can be preserved and inherited in the new era on the other.

We expect that i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urbanization, researchers and planners can analyze children's needs and the inner laws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from details, and establish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targeted solutions and planning visions to help childr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ld-Friendly Cities and Prospects for Chinese Practices

Oral Accounts / SHEN Yao Edit / SHAN Bingqin + ZHANG Xindan [Hunan University]

The future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is very promising. First, the concept of "child-friendly"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17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2030, reaching a global consensus, and is also a sub-goal of Goal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which is about how people can live sustainably in cities. Children are the futur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ir problems with cities will become future problems. This will also become a common bond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hen discussing their own urban development issues, a cohesive theme that can gain international resonance.

Personally, I also have high hop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in China, as it fits highly into the trend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fewer children that China is currently facing. The core of this issue lies in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will the generation of urbanites in 20 to 30 years get along with the city, and what kind of development will it bring to the city. In the present, "child-friendly" may seem like talking about kids playing, but in 20 or 30 years, when the real next generation grows up

and begins to govern the city, contribute to the c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t that time, the impact of the first 30 years of child-friendly practices will be tested, and the results of how the next generation thinks about cities will emerge.

Through our research on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we have found that the elements of cities that have a large impact on children include family, school,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 themselves related to their physical bodies, so the effects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construction are difficult to be quantifi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this regard, on the one hand, city practitioners and decision makers need to have a long-term and sober understanding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designers and planners need to put more effort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of the laws of adults, children and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in scientific design and research, to think deeply and gradually discover the logic and scientific laws. In addition, academia needs to conduct more long-term research, and can start to prepare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20 or 30 years of empirical research.

When "Child-Friendly Cities" Go Down to the Community

Oral Accounts / DONG Nannan Edit / SHAN Bingqi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national and local experiences have mapped out inclusive design,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directed at community serviceability. The current concept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and communities may still need some deepening of understanding. First, child-friendly facilities are part of a city's service offerings for children, and design is not just about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indoor and outdoor facilities, but also about the "products" that include policies.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design special services for children, which means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child-friendly services in the whole area. Currently, we are slower to follow up on child-friendly norms and standards than on cutting-edge projects, 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needed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a consensus-based collective action. Second, being child-friendly does not mean focusing merely on children rights. In fact, children are not a separate group of people in the city, but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ir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Therefore, in child-friendly design and planning, I do not advocate simply delineating different scenarios such as neighborhoods and schools, which are intertwined in the growth of children. We prefer to call it "children's infrastructure".

In terms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 trend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national to the local level, including the cities that have taken the lead, some action plans for "child-friendly cities" or "child-friendly communities", or some guidelines or plans have been issu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se efforts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advancement of child-friendly services at the city or community level as a whole.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see more and more social forces in the city and society, including communities, NGOs, and citizen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micro-renewal, providing more ways for children to get in touch with nature or grow up in a healthy way in the process of joint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some new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that propose to improve the service capacity for children, giving birth to many rel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From these phenomena, we can see the attitude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 personally believe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s is that we are not paying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role played by children's families. If a child lacks high-quality companionship from parents and family members, it is not enough for us to simply improve the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the community and schools. In fact, many of our policies should go through the family to implement more of the benefits of space and being served for children.

Pioneering Practices of Child-friendly City Building in Shenzhen

Oral Accounts / LIU Lei [Edit](#) / SHAN Bingqin

The City of Shenzhen is the first city in China to systematically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In the process, we have basically formed the backbone of the child-friendly city field, especially the main elements of the spatial field are completely included. As a result, other cities are learning from Shenzhen's experience in the current round of child-friendly city construction nationwide. Some cities may learn from the systematic nature of Shenzhen's experience, while others may learn from parts of it, e.g., the community aspect. When it comes to concrete operations, it basically also shows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women's federation or it plus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take the lead.

The first version of *Shenzhen's Child-Friendly City Strategic Plan* and Action Plan has given the country a relatively good framework for macro- and micro-level learning.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plan, and the operational paths (e.g., pilots, guidelines, etc.) contained in each section, were first proposed by the Shenzhen Women's Federation together with the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of Shenzhen. Through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plan, Shenzhen defined the overall framework, conducted supporting research and design, and developed corresponding guideline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forming the Shenzhen model tha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cities. For the guidelines, we did not call them "standards" because we provided them as a reference manual for everyone, rather than a high level to make everyone do the same. In addition, in some details, since Shenzhen's operation is more systematic, from traffic streets to public spaces, there are certain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ccumulated, which can provide experience for all cities to learn from.

Of 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in Shenzhen, we also found some problems. The first problem is the lack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the field. Since the women's federation is a group organization, the amount of funds allocated to it each year is limited, and after these funds are allocated to various projects in a city as large as Shenzhen, it amounts to very little. In many projects, we need to collaborate with various regions, with various institutions to do some research, with such limited funding support, it became very difficult. The newly issued *Guidance on Promoting Child-Friendly Cities* involves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support, proposing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play a guiding and leveraging role of investment within the central budget to actively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and that projects for children's service facilities that are affordable and have certain benefits can be included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special bond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licy partly alleviates the current funding difficulties. However, we should also be awar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s Child-Friendly Cities construction involve large-scale, coordinated construction across various districts and departments, and require research on how to lead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with a predictable amount of funding. The above policy document serves as an opinionated guid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go deeper into the guidance of a specific project. For the whole country is starting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it is a question worth exploring how to match the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support.

Secondly,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 we are asked in practice is "Can you give me a process?" In practice, many grassroots governmental workers do not have the technical power nor the tim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depth of the "child-friendly city" concept and how it translates into the language of space or social service systems. They are often desperate for so-called "points", i.e., standard guidelines, and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processes", while neglecting to identify the real needs of the district, develop targeted public policies, and provide customized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service 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found that some cities have rushed to develop a set of standards for child-friendly cities without any grassroots practice. The above practice approach, which goes against the inner laws, can easily distor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create a campaign to promote child-friendly cities after they become a policy windfall. At the national level, China needs to build a full child-friendly city system in the next five years, including a series of assessment systems, directional guidelines, operational specifications, and planning systems. Current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y makers are actively exploring this with UNICEF. However, when these systems are implemented to each city and community, whether local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can be practical and flexible in governing within this system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s the key to test whethe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can be successful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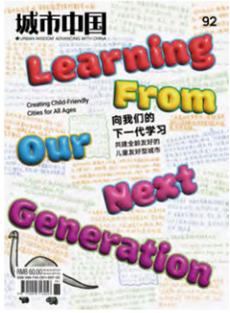
The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of Shenzhen has previously studied the practice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in various cities in Germany. In Germany, there is a committee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and each city proposes its own plan according to its own needs, including which specific projects to do each year, the form of organization, financial support and flow, etc. These plans are approved by the committee before they can be implemented and evaluated after implement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not only children will be involved, but also the mayor and UNICEF will be represented, so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people will be maximized. I think this is an approach that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However, Germany has a very small population compared to China and does not have such a large volume of cities as we do. The reality of China may lead to non-refined grassroots work and reliance 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implementation, but with the progress of urban renewal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 believe we will eventually achieve refined city management.

Building Child-Friendly Cities Based on Social Environment Education

Oral Account / PENG Wanyan + JIAN Yingshi + LI Ziruo [Interview](#) / DING Xinyi [UCRC] [Edit](#) / SHAN Bingqi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the unbalance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patially clustered some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groups.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bridgehead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a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province, highlights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ing class" in factory communities under social inequality, as well as the problem of whether they and their children can be accept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community amicably in urban villages where a large number of local residents and migrant workers live together.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has brought local sustainable education to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expanding children's activities and horizons in a localized manner, and promoting positive integration of children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y environments. Such an experience is suitable for replication in any small or medium-sized city, county, factory, or rural area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concerns of child growth are dismantled and specialized. Beyo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child-friendliness need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sitive effects that family companionship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bring to children's growth. What is a child? What is the urban experience of children? How are children raised, and how do they grow? What kind of equity can public spaces and resources provide? This requires reflection and discuss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both the individual child and society. Spatial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should provide a safer, more convenient and friendly experience for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and include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ommunity creation, which will greatly benefit children in gaining social experience and promoting their own growth. In general, society should realize equal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ifferent professions and group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Ensuring equ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each family and a variety of public resources for each child's growth and independence is the most intuitive expression of child-friendliness.



城市中国 Urban China

向我们的下一代学习
共建全龄友好的儿童友好型城市
Learning From Our Next Generation
Creating Child-Friendly Cities For All Ages

总第92期

本期课题组

[课题统筹] 谭健宁
[课题主持] 山冰沁
[责任编辑] 谭健宁
[美术设计] 七月合作社
[课题组成员] 袁菁 李娟 丁馨怡 周艺娴
[封面设计] 七月合作社

儿童作者鸣谢名单

纪葛晨希 王梓谦 盖铭辰 何诗琦
方优璇 顾奕 陈泽勉 陈恩佑 吴佳怡
费昕悦 褚皓文 陆一畅 汤陈奕 李想
宋无忧 吴俊豪 马鑫蕾 金杨 孙逸兮
马昱睿 沈欣宜 曹宇星 杨雅婷 高冉
钱谊仁 钟毅轩 汤佳郡 盛静怡 徐俊杰
周粤涵 柯亦馨 吴奕欢 俞宁萱 陶文浩
徐思阳 丁依涵 潘语茁 雷雨涵

RMB 60 / HKD 60
USD 20 / EUR 15
GBP 12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

[主 管] 中国出版集团
[主 办]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 版] 中国出版期刊中心
[协 办]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上海城道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国内顾问] 邹德慈(中规院) 柯焕章(北规院) 吴志强(同济大学) 阮仪三(同济大学)
诸大建(同济大学) 姜永琪(同济大学) 孙施文(同济大学) 汤惟杰(同济大学)
张松(同济大学) 朱锡金(同济大学) 张闯(同济大学) 李翔宁(同济大学)
刘家琨(家琨建筑) 史建(一石文化)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 袁奇峰(中山大学)
张兵(中规院) 周榕(清华大学) 周俭(同济规划院)
邹兵(深圳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王富海(深圳)

[国际顾问] 瑞姆·库哈斯(OMA-AMO) 马清运(马达思班/南加州大学)

[编委会] 顾敏琛 匡晓明
[总编辑] 萧歌
[总编辑] 匡晓明
[总监制] 杨德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李娟 崔国 黄正骊 丁馨怡 宋代伦 杨松飞 唐菲 张晶轩
[主任编辑] 谭健宁
[文字编辑] 袁菁 山冰沁 周艺娴
[市场主管] 崔国
[网络主管] 盛刘申
[出版项目经理] 屠茜

[特约观察员] 李雨菲(剑桥大学) 李秀政(UCL) 王曼琦(UCL) 董心悦(曼彻斯特大学) 王正丰(都柏林大学) 邹琳(海德堡大学) 熊志嘉(ETH)
刘文(多伦多大学) 张威(新加坡国立大学) 王婷(香港大学) 孙聪(深圳大学) 杨辰(同济大学) 刘杰尘(中国传媒大学) 李正东(宁波大学)
庞思吟(上海) 王超逸(深圳) 李康(深圳) 朱静宜(伦敦) 司维(巴黎)
赵璟榭(香港) 邓菲(北京) 张天娇(波士顿) Harry den Hartog(荷兰)

[特约编辑] 周详(东南大学) 严娟(同济大学) 倪瑜遥(澳门大学)
金怡菲(武汉) 张起(武汉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规划研究中心)

[合作课题组]
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研究部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
中心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 国家发
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 上海市政府
法制办公室 /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 上海社科院城市
与区域研究中心 / 荷兰动态城市基金会 / 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 / 德国技术合作
公司 / 深圳双年展 / 威尼斯双年展 / 卡塞尔文献展 / 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 /
荷兰新城研究所 / 中法建筑交流学会 / 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研究中心 / ADU
管理咨询公司

[智慧资源] 北京大学 / 复旦大学 / 华东师范大学 / 东南大学 / 同济大学 / 中山
大学 / 南京大学 / 武汉大学 / 重庆大学 / 香港大学 / 香港城市大学 / 香港中文
大学 / 哈佛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 / 伦敦AA学院 / 伦敦政经学院 / 伦敦大学学
院巴特莱特学院 /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 英国诺丁汉大学 / 宾夕法尼亚大学
/ 哥伦比亚大学 / 加利福尼亚大学 / 威斯康辛大学 / 南加州大学 / 东京大学
/ 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 / 柏林工业大学 / 纽伦堡大学 / 魏玛包豪斯大学
/ 巴塞罗那建筑学院 / 哥本哈根大学 / 巴黎政治学院 /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
海德堡大学 / 贝尔拉格学院 / 瑞士苏黎世工业大学 / 新德里大学 / 印度孟买
KRVA建筑学院 / 新加坡国立大学

[营运机构] 上海华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杨浦区中山北二路1121号同济科技大厦7楼(200092)
[电 话] 8621-65982080
[传 真] 8621-65982079
[发 行 部] 上海 汪晓露 021-65982080-8032

ISSN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163
CN国内统一刊号: CN 11-4557/G0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朝工商广字 D8041号

[版权声明] 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地图、光盘等资料的版权归中国出版期刊中心所有，凡未经授权以任何方式转载、复制、翻印及传播，本刊将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特别声明] 本刊刊载的作者言论并不代表本刊观点。

[Authorities in Charg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Sponsor]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ublishing] The Center of China Periodical Press
[Associate Sponsors]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Design Institute
Shanghai HuaDu Architecture & Urban Design CO.,LTD.
Urban China Research Center (UCRC)
Shanghai Chengdao Properties Consultancy LTD.

[Domestic Advisors]
Zou Deci(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Ke Huanzhang(Beijing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WuZhiqiang(Tongji University) Ruan Yisan(Tongji University)
SunShiwen(Tongji University) TangWeijie(Tongji University)
ZhangSong(Tongji University) Zhu Xijin(Tongji University)
ZhangHong(Tongji University) Liu Xiangning(Tongji University)
Liu Jiakun(JiaKun Architecture) Shi Jian(IS-Reading Culture)
Wang Fuhai(Shenzhen) Yuan Qifeng(Sun Yat-sen University)
Zhang Bing(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Zhou Rong(Qinghua University)
Zhou Jian(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Zou Bing(Shenzhen Urban Planning & Land Resource Research Center)
Lu Ming(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dvisors] Rem Koolhaas(OMA-AMO)
Ma Qingyun(MADASpam/USA)

[Editorial Committee] Gu Minchen Kuang Xiaoming
[Senior Editor] Xiao Ge
[General Editor] Kuang Xiaoming
[Supervisor] Yang Cai
[Urban China Research Centre] Li Juan Cui Guo Huang Zhengli Ding Xinyi
Song Dailun Yang Songfei Tang Fei Zhang Jingxuan
[Editorial Director] Tan Jianning
[Text Editor] Yuan Jing Shan Bingqin Zhou Yixian
[Marketing Administrator] Cui Guo
[Network Administrator] Sheng Liushen
[Publishing Project Manager] Tu Han

[Project Cooperator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 World Heritage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er
of 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rea\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 Sciences\Reform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City and small town of the Stat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Legal Affairs Office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SIFL Institute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Centr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olland Dynamic City Foundation\French Dynamic City
Foundation\German Technical Cooperation\Shenzhen Biennale/Venice
Biennale/Kassel Documenta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ural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Institute of Holland New Town Research \Sino French
architecture Exchange Association \ Beijing architecture research center,
Columbia University\ADU Consulting

[Management] Shanghai Huadu Advertising and Media Company
[Add] 7th Floor, Tongj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ilding, No.1121
Zhongshan North-2 Road,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092)
[Tel] 8621-65982080
[Fax] 8621-65982079
[Circulation Manager] Shang Hai: Wang Xiaoxia 021-65982080-8032

ISSN: ISSN 1009-7163
CN: CN 11-4557/G0



《城市中国》 iPad新版APP



继续寻找与纸刊、微信之间的传播矩阵平衡
APP平台将作为唯一渠道，
推出部分文章完整英文版，以飨海外读者
同时将不定期推出特别策划的别册内容，
与微信独家策划主题呼应

